



戴璉璋教授 (1932-2022) 紀念專輯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編者識

本所故籌備處主任戴璉璋先生於今年元月八日清晨，因心臟衰竭病逝於臺北市北投振興醫院，享壽九十。喪禮於二月八日假臺北市立第二殯儀館隆重舉行，遺體隨後火化，並移靈陽明山臻善園花葬。

嗣後本所同仁共同決定為戴先生舉辦一場追思座談會，並為本刊編輯一個紀念專輯。追思座談會於今年七月七日於本所舉行，會中分別由楊祖漢教授報告戴先生的易學研究，由謝大寧教授報告其魏晉玄學研究，由王錦慧教授報告其語法研究。

至於紀念專輯，則由本所同仁分別邀稿，邀稿對象包括戴先生的家人、本所資深研究人員及退休研究人員，以及戴先生的門生、故舊，總共徵得二十三篇紀念文字。此外還有三份附錄。第一份是戴先生親自撰寫的自述〈溯源紀行〉，原收入唐宗龍主編的《血濃於水赤子情》一書。此文包含戴先生早年的經歷，以及若干不為外界所知的事情，從中可以認識戴先生的志向與為人，是十分珍貴的資料。由於此書係於二〇一四年由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臺灣讀者不容易看到，故本刊編輯部特地將它重新排版、校訂，以供戴先生的親朋、門生、故舊懷想其人。

此外，戴先生於逝世前一年完成《周易經傳疏解》一書。戴先生在撰寫過程中，當時在本所從事博士後研究的羅聖堡先生提供了不少協助。該書完稿後，羅先生親自到戴先生寄寓的陽明山至善安養中心，請戴先生自述其撰寫該書的歷程，並將錄音轉成文字檔，成為本專輯的第二份附錄。該書出版之後，本所組織了一個讀書會，邀請一批年輕學子研討該書，並將討論過程做成紀錄，呈給戴先生閱覽。戴先生則以信函回應這些討論涉及的問題。他的回應則是本專輯的第三份附錄。從以上二十三篇的紀念文章及三份附錄，戴先生的人格與風範躍然紙上，留供後人無盡的追思。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璉璋與三位恩師

唐亦璋*

璉璋常說，影響他一生的有三位大學老師，他們分別是他心目中的三種典範：許世瑛老師是溫煦的良師典範，屈萬里老師是樸實的經師典範，牟宗三老師是智慧的哲人典範，使他受益良多。許老師戴著深度近視眼鏡，講課時雙眼必須緊貼在教材頁面，才能看清楚上面的文字。璉璋大一時上許老師的讀書指導課，考試他得到全班最高分。大二時許老師講授的國文文法，他也學得很好。許老師便常找璉璋到他青田街的家中幫忙，替他校對臺灣開明書局將出版的老師著作：《中國文法講話》一書；有時弄到吃飯時還沒法歇工，師母便邀他與他們一同用膳。許老師在撰述《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期間，也同時在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講授文法研究。璉璋考進研究所後，修了老師的這門課程，經常聽老師逐句分析、討論《論語》的句法結構。他也參與其深究研討。他的碩士論文便請許老師指導，順利地通過而拿到碩士學位。他早期的論文以研究語法的居多，且多以經典作資料，如《尚書》、《詩經》、《左傳》等典籍，由篇章語句的結構，可見古代語法的真相；其中較重要的論著有〈殷周構詞法初探〉、〈古代漢語的語序變換〉、〈上古漢語的句法發展〉等，總結了他探討古代語法的心得。璉璋對經典的嫻熟，有利於他日後研究義理時，對古籍章句的正確掌握。記得有次牟老師來我們家聊天，還與璉璋琢磨《孟子》中章句的精當解釋呢！我就說，他做學問像是蓋房子，一磚一石建構起來，紮實而沒偷工減料。

許老師除在師大專任外，還兼臺大的課，又受張建邦院長請託，出任由淡江英專升格為淡江文理學院的中文系主任。璉璋碩士畢業後，許老師就邀他去淡江任教，讓他在系上開了四門專書課程：中國哲學史、《尚書》、《禮記》、國文文法。

* 唐亦璋，戴璉璋教授夫人。

他便整天埋首在書堆中認真準備上課教材，絲毫不敢懈怠，總算沒讓老師失望。我也辭去一女中教職，跟著他去淡江教書，舉家便由臺北市搬到淡水的淡江教職員宿舍居住。民國四十年代公教待遇菲薄，我倆又沒養育嬰幼兒經驗，更不熟悉淡水的醫療診所。因此，兒女生病就坐計程車趕往臺北的大醫院就診，弄到每月寅吃卯糧，只得厚著臉皮走進許老師家，向他開口借錢周轉。許老師聽到後，立刻轉身進臥室，取出一疊鈔票，還問我們夠不夠用。等我們領到薪水奉還他時，他總說：「急甚麼？有需要儘管對我說，沒問題的。」當時若沒有許老師的救急，那段日子真不知怎麼活下去！

許老師沒有子女，很愛護學生，又喜歡熱鬧。因此，同學們都喜歡去他府上聊天，閒話家常。每逢他壽誕那天，他便在大餐館訂下兩、三桌酒席，請熟識的臺大、師大同學前來飽餐一頓，算是為他慶生。知道璉璋與我交往將論及婚嫁時，許老師還由他租用的三輪車夫攙扶著走進師大女教師宿舍，拜訪我寄住的龔慕蘭老師。那天我正從學校授課回家，看到停在大門口的三輪車上坐著許師母，她沒進去，正坐在車上等候老師呢！這感人的一幕令我終身難忘。而我從師大畢業進北一女中任教，是請我新竹師範校長張雲縉老師推薦的，他與一女中校長江學珠過去都是江蘇省出名的中學校長而彼此熟識。豈料許老師又自願為我向江校長舉薦。事後璉璋才告訴我，很後悔當我進入北一女任教後，竟忘記向許老師道謝。「二璋」這個稱謂，還是許老師賜給我倆的呢！

璉璋在淡江執教時，還發生了一段插曲。許老師擔任系主任後，他在臺大、師大的課業已繁重，又多了淡江的系務，實在分身乏術，便找璉璋代理系務。璉璋只要遵照既定規章辦事就好，系務推展也平順。一天，我們家裏忽然來了兩位不速之客，一位是當時淡江的訓導長，陪同著另一位書店老闆，也是璉璋昔日師範大學的學長，氣勢洶洶地進到我家，與璉璋大吵起來。事後才知這位書商因捐給淡江四百本圖書，張院長便許諾他可來淡江中文系任教，偏偏璉璋不同意，他們便來家裏算帳。後來，璉璋忍不住向許老師訴苦，希望證實院長是否果真有此承諾。許老師為此向張院長求證，豈料他完全否認有此事。璉璋痛苦地告訴老師，他無法處理系務了，願辭職離開淡江。老師聽了非常難過，苦勸璉璋務必隱忍，還說：「你若辭職，那我也跟你同進退好了。」璉璋怎能讓許老師太為難？便吞下這口氣，卻埋下他後來決意離開淡江的想法。這也提醒他，日後處理行政事務，必須保存原始檔案，以免口說無憑，不能還原事實真相。他後來進中研院接掌文哲所籌備處工作

時，處理人事問題，就靠保存原始檔案才沒留下任何爭議。

許老師身體一向健朗，因視力障礙，很少運動，難免肥胖而患有心臟病，不幸竟在他失明的第三年冬季，毫無預警地心肌梗塞，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辭世，享年六十三。許老師去世後，他在師大的國文文法課程，系中同仁無人接手。程發軔系主任就想到璉璋，便聘他回師大，講授此門必修課程。他即辭去淡江教職，回師大專任，前後二十三年。

許老師去世後，留下許師母一人住和平東路二段的師大教師宿舍。師母是清朝王室後裔，虔誠禮佛，又樂善好施，經常要我替她去郵局作「雪中送炭」劃撥捐款。她好些事都找璉璋商量，我也跟著他進出許府，如：師母想替老師整理他一生的著作，出版全集，便與璉璋商量找合適的書商，終於全集得以出版問世，了卻師母一樁心事。一向與老師、師母交情好，也信得過的開明書局劉老闆，向師母借了一筆錢週轉，說好每月付息，結果被他倒帳，連本金都沒要回。她也與璉璋商量對策，但狠心的生意人怎麼追討都沒用，讓師母痛苦好一陣子。她又要璉璋為她預立遺囑，交代遺產如何分配。她向我傾訴大便失禁之苦、清洗床單被褥之累，我便替她買棉墊送去，供她使用。我也陪師母造訪她住在基隆路上的故舊，後來才知她是向老友作最後道別。直到有天，璉璋接到師母隔壁鄰居的電話，要他趕快去一趟，才發現師母已懸吊在門框上自盡多日！待處理完師母後事，璉璋與我又去了一趟北京，替師母完成她深藏心底不欲人知的心願，最後我們終於達成任務，感謝蒼天！讓我們盡到弟子的責任，沒辜負倆老對我們的厚愛。

璉璋任教於淡江文理學院時，每逢農曆大年初二，必與師大昔日同窗朱守亮教授兩人相約結伴，去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向屈萬里老師拜年、請益。他們如此敬重、感激屈老師，實因當時的臺灣物資匱乏，文化出版事業少有人經營，所以人們稱它為「文化沙漠」。書店僅兩三家，做學問，想看書，拿錢也買不到想看的好書，更不可能接觸到善本珍藏的古籍。他們常是輾轉坐公車去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借閱論文所需要的書籍，將它們摘錄抄寫下來，以備引用。但善本書是不對外開放借閱的。屈老師知道後，便給兩人各一張自己的名片，上面寫著：「請管理員允許二人借閱任何需要的參考資料」等幾個字。從此他們就充分借閱館藏善本，摘要抄寫，論文的內容自然充實許多。

大年初二走進屈老師的研究室內，看到老師依舊坐在書桌前看書做學問，一如平常。正如屈師母費海瑾女士的一篇文章〈屈萬里的治學與史語所〉中所寫的：

「民國三十三年底，屈老師給自己訂的課程表為例，首先訂出這兩年內用功的目標範圍：1. 甲骨文、金文。2. 殷代及西周史實（含政事、官職、祀典、習俗）。3. 周易。4. 陰陽五行。5. 齊學。6. 黃老。7. 古書年代。再訂出時間分配：1. 每日午前讀 2 小時甲骨、金文。2. 每日午後讀 1.5 小時先秦經籍。3. 每日午後及有空暇時間看新出版的書籍。4. 每年 1、2、11、12 四個月，每天晚上 2 小時治易經。5. 每年 3、4、9、10 四個月，每天 2 小時。5、6、7、8 四個月晚上空閒時，看史書及雜書。6. 每日晨起到早飯前為溫書時間。」

看到屈老師規畫得這麼詳細的讀書計畫與時間表，才瞭解因戰亂時局動盪，導致他正規的學校教育僅止於北京的郁文學院肄業，卻憑其天賦、超人的毅力，勤奮地自修苦讀，終於使他在古典經籍的研究論述上大放異彩，當上臺灣大學中文系及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璉璋何等幸運，當屈老師在臺灣師範學院也兼授《尚書》時，他與守亮正是講臺下聽課的學生。他們敬重屈老師經學的深厚功力，但凡書中艱澀的文辭奧義，經他旁徵博引甲骨與金文資料佐證詮釋後，都能豁然了悟而受益。璉璋就說：「聽老師講課，從來不會打瞌睡，反而是忙不迭地抄寫老師的板書，深怕有所遺漏。」早年（1963 年）璉璋在許老師的指導下寫成《今文尚書指稱詞探究》論文，獲碩士學位。次年又寫了〈《尚書》句首、句中、句末語氣詞探究〉，兩年後再寫出〈《尚書》判斷句、準判斷句探究〉，又兩年，完成〈《尚書》連接詞複句關係辭探究〉論文。璉璋採用屈老師著的《尚書釋義》作語法分析，又善用往昔上課聽講的筆記，終於完成《尚書》字句文辭多方面的探討。接著璉璋又致力於《詩經》語法的分析，一九七三年三月寫成〈《詩經》虛詞釋例〉，四月寫出〈《詩經》疑義考辨〉。一九七六年完成〈《詩經》語法研究〉論文，也是採用屈老師著的《詩經釋義》完成的。他認為只有根據老師這兩本考證詳實、註釋精當的著作所做的研究，才有學術價值。將近半個世紀後，他晚年最後一本著作《周易經傳疏解》參考引用的許多資料，依舊是屈老師的大著《讀易三種》。看來璉璋的著作，多半奠基在屈萬里老師這塊大磐石上，所以他由衷地敬佩感激屈老師。

當璉璋完成〈《尚書》句首、句中、句末語氣詞探究〉後，寄給屈老師請他指教，老師竟回函：

璉璋老弟：

來示敬悉

大著尚書句首、句中、句末語氣詞探究一冊，亦於同日拜收。愚講授尚書，於其語氣詞，每苦不能作一概括之說明。得弟此作，可以據為教學之資矣。欣快何似！謹函申謝，並頌近好

愚小兄屈萬里敬啟

屈老師回函，親切謙和，展現大學者風範。

在此期間，屈老師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之聘，赴美講學。他給許世瑛老師的信中，還提起璉璋在古代語法方面的斐然成績，希望許老師繼續指導，並做進一步探討，即與西周金文做比較，雖費力，成就必有可觀。此郵件未提到：「初到此，日飲威士忌，然洋酒既貴，究不如高粱之可口，飲後亦不如高粱之舒適。」許老師將此信轉給璉璋。他看信後，深受感動，便寄上兩瓶金門高粱，請遠在異國的屈老師飲用。屈老師給璉璋回函結尾：

承 寄高粱酒二瓶，實勝百朋之錫。作書至此，已饑涎欲滴矣。應是真情流露，而非客套。

一九七二年齊邦媛教授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兼教科書組主任時，有意推動國中國文教科書的改編，她力邀臺大中文系主任屈老師擔任該教科書的編審委員會主委。屈老師便邀集張亨教授代表臺大，應裕康教授代表政大，璉璋代表師大。三人通力合作，從挑選適合的教材，到將選定後的各篇文章一一作註、解題，賞析深究，設計問題等等，都由他們三人負責包辦，工作既繁重又瑣細。一年半後，應、張兩教授相繼退出，由吳宏一教授接下後續重任。他與璉璋將三學年共六冊國中國文教材編寫完竣後，又參與其修訂、增補工作，前後共花了近十年時間，才結束任務。他們辛勤地付出，總算編出一套令學生喜愛、授課老師也獲益的課本，廣獲好評。這套教材，除所選的文章多為清新的文學作品外，並另編了一套教師手冊，供教師教學時參考。在屈老師手下工作是愉快的。他並不過問他們工作的細節，彼此卻有個共同的理想：要把學生的語文程度提升，要讓年輕學子喜好國文。偶而老師也自掏腰包，請他們去會賓樓餐館小酌，犒賞慰勞一番。之後老師擔任大專聯考國文科命題主委時，又拉璉璋與丁邦新、羅聯添教授，三人負責出考試題目。璉璋性格的執著，使他在承擔任何工作時，都負責到底，堅持達成。

牟宗三教授教他們大一的理則學、哲學概論、大三的先秦諸子、大四的中國

哲學史。這幾門課璉璋他都有興趣，也學得好。當時校方開放校園，鼓勵教授們課餘也能對失學青年、社會人士開講，提升光復初期社會的讀書風氣。大三時，牟老師主動邀集同學成立「人文友會」，璉璋與同班同學王淮、朱守亮、馬光宇、唐亦男等人，成為友會的主要成員，每兩周集會一次，由老師主講中國傳統文化及思想問題。在大陸淪陷、傳統思想遭摧毀殆盡之時，他深切透關的論述，確實吸引了許多好學青年前來聆聽問學。像蔡仁厚、周群振教授，便因老師的感召而放棄軍旅生涯，改習中國哲學而有成就。一九五六年老師轉到東海大學任教，連續兩年的友會講習便結束，卻凝聚了師生間厚實的感情。當璉璋初赴淡江講授中國哲學史時，還請示過老師。他回函：

哲學史一課並非易講，我以前所講亦只是初陳大略。近數年來始講得扎實諦當。《才性與玄理》望能仔細看，此書讀通，思過半矣。俟宋明一段整理訖（《心體與性體》），再把《佛性與般若》寫出（南北朝一段），對於中國哲學可無憾矣。

璉璋想必將老師提示的《才性與玄理》等語牢記在心，後來終於寫出他自己廣受好評的著作《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

一九七四年牟老師在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十月華岡的中國文化大學聘請老師來臺講學。璉璋得知這難得的機會，便請老師在師大教室開講，一則解決他上山授課往返的不便，再則希望方便臺北各大學學生前往聽講。璉璋後來才說，在老師師大的幾場講課中，他才真正聽懂牟老師的學問。中國文化大學不按時給付薪資，令老師困惑。璉璋便與張亨教授商量，請當時臺大哲學系主任黃振華教授向教育部申請，聘牟老師為哲學研究所客座教授。黃教授申請成功，便致函香港，邀牟老師來臺講學。老師接信後考慮再三，前後寄璉璋三郵件，不外是擔心住、食等起居細節。璉璋告訴他免租屋、免吃學校伙食等，他才放心收下聘書，準備啟程來臺。臺大將空置已久、又寬闊的學人宿舍供他一人居住。璉璋便親自督促工友打掃清理，還贏得管理員的讚美，又安排學生照護老師起居。一九七六年九月，牟老師終於應客座三年之聘，在臺大哲研所主講「宋明儒學」及「南北朝隋唐佛學」。老師在臺講學不輟，著述更豐，聲望日隆，《聯合報》便多次邀請老師作公開演講。在一次講論〈文化建設的道路〉時，聽眾座席中，竟出現日理萬機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以及文建會主委陳奇祿先生。這次所講，密切關係著臺灣文化的發展，可見老師實在是默默推動文化改進的功臣，一九八四年三月還獲行政院頒發的國家文化

獎章呢！而牟老師的家庭經濟卻因師母理財失策而有虧損。當時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博士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博士，就替老師爭取到國科會的三年講座教授待遇。杜教授與璉璋商量後，決定將講座設在師大，由璉璋直接找校長梁尚勇先生、國文系主任黃錦鉉教授洽談禮聘。一九八五年九月老師應聘來臺，為師大研究生講授「中國哲學專題研究」。待一切辦妥安頓後，璉璋便告訴老師，他將啟程赴新加坡，應東亞哲學所之聘，在獅城工作兩年。老師說：「怎麼我一來，你就要離開啊？」璉璋要老師放心，他已交代系裏助教莊耀郎替老師處理一切事務。後來莊耀郎請牟老師指導博士論文，劉錦賢、顏國明、王財貴、謝大寧、李美燕、林月惠應都是聽課者，且都在各自專業上耕耘有成！

牟老師來臺講學的這些年，師母仍住香港。他就像候鳥般，來臺授課數月，講完便返港休息一段時間，臺、港兩地往返好些年。直等東方人文學術基金會在永和購下一層住家公寓，師母才搬遷來臺，老師才結束長期的奔波。

一九九四年牟老師病重之際，璉璋去醫院探視，老師便示意安排後事。璉璋偕同王財貴夫婦及王邦雄教授等人為老師尋覓墓地。一九九五年四月，老師得以長眠於李祖原建築師設計的新店青潭之長樂墓園。

「先生與在臺門人書，嘗云：『新亞退休之後，當略師孔子歸魯之意，返臺作數年講學，以培養青年，留下一個線索，於願足矣。』」（見《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學行記要》，頁 43）老師最大的心願就是師法孔子講學傳道。璉璋何其幸運，一直在臺北任教，有機會協助老師達成願望，肩負起一些瑣事，有更多的時間親炙老師，也是很光榮的。

綜觀牟老師一生學術成就，真不愧是當代的學術巨人。他自謂：「我的一生，可以說是『為人類價值之標準與文化之方向而奮鬥以申展理性』之經過。」牟先生逝世前百餘日，曾索筆寫示門人，其中有云：「一生著作，古今無兩。」這「古今無兩」四字，他的得意門生、旅美學界李淳玲女士在她的〈哲學與哲學家：康德與牟宗三合論〉詮釋得很貼切（見《鵝湖月刊》第 423 期〔2010 年 9 月〕）。

牟老師當年默默耕耘播種，今天終於看見成效。現在各大專院校主講中國哲學思想的教席，很多人受過牟老師的指引薰陶。他們或受邀在國外高等學府客座，弘揚儒學，或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與西方學者交換心得，也有在兩岸推動兒童讀經的，像《鵝湖月刊》辦得有聲有色，現在更肩負起推動兩岸儒學交流的重任。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正往全球傳播擴散，這豈是老師生前所能料到的？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給我的父親

戴祖達*

從小爸在我心中就是一個非常完美、遙不可及的形象。在我小時候，我想過要跟上他，做一個讓他滿意的「乖兒子」。後來發現真的是談何容易，太累了，有必要活成這樣嗎？爸不僅做學問認真，生活也認真。在這樣的一座大山面前，我放棄了，我過著我想過的擺爛生活。我以為這才是人生，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我著實深深地傷了我父母的心，可是我那時好像也不太在乎。我想，在那段日子裏，爸可能也放棄了他對我的所有期待。

我在「追求快樂的生活」的這幾年，發現所謂的快樂越來越索然無味，後來運氣很好地選了一個還蠻適合自己性向的專業。因為興趣的關係，就會想要去了解一下該怎麼做才會更好。看了一些書，才發現原來在做得更好的那些技巧後面，其實還有一個「道」。而且不只我這個專業後面有一個「道」，各行各業後面其實都有一個「道」。我很好奇，這個道究竟是什麼？跟我們傳統講的「道」一樣不一樣？就在這樣一個契機下，我想起爸寫的有關魏晉玄學的書，於是就拿起來看一看。

在《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那本書中，爸討論了王弼的「返無全有」、「因有明無」這樣的概念，剛好可以讓我把在自己專業上做得更好的那些技巧（有），以及技巧背後之道（無），相連起來。我想，如果把做人，該怎麼生活，該怎麼做一個丈夫、兒子、主管、下屬……看成一個專業，這道理是完全相通的。如果我會去追求怎樣把自己的專業做得更好，那麼爸的追求做一個更好的人，不也是一樣的意思嗎？

在有了這樣一個體會之後，我重新認識了爸。我發現他原來跟我一樣，只是一

* 戴祖達，戴璉璋教授長子。

個想把自己的專業做得更好的人而已；而他的專業，不只是學術上的研究，同時也是在做人做事的生活之中。因為他研究的學問，講的是「知行合一」，身體力行，所以在生活上，他也總是活得那麼認真。我小時候從旁看無法體會，後來才了解，是啊！人不就是應該時時在想如何做一個更好的人嗎？

做一個更好的人（也就是傳統講的「君子」），並不是我小時候想的，去展現一個完美形象在所有人面前，然後叫大家都去跟從（或是覺得無法跟從）。其實剛好相反，「做一個更好的人」的出發點是要能先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然後以自己的能力及判斷力，真誠地在你能力所及之處與人做一個最合理的溝通。這也就是爸常說的「敬以直內」（確切地表達內在的心意），「義以方外」（按正當的道理因應外在事物）。從專業上來講，為什麼這個產品這麼好用，不就是因為它能先考慮到各種各樣人的不同需求，在那樣一個認真的心態下，與大多數的人做到最好的溝通嗎？

原來這個所謂的什麼什麼之道（煮菜之道、寫程式之道、做生意之道、建築之道……），是來自能真誠地從對方的角度來想，以傳統的說法，就是仁心、愛心。以仁心、愛心為出發點，發揮自己的所學專長，達到與人最妥善的交流，也就是義，「義以方外」。這就是道，仁義而已矣。

在我了解這些道理之後，我才知道爸原來是那麼的溫暖。小時候無法體會他的愛心，所以才會「望之儼然」，甚至排斥；後來慢慢接觸到了，慢慢了解了他的學問的一些皮毛，才感受到「即之也溫」，感受到他的愛心。因為出於愛心，所以要活得認真。活得認真是為別人，而不是為自己。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在去年爸身體出狀況時在醫院裏陪他。在他換完心律調整器之後，雖然看他還有點累，我還是趁他精神好點時跟他說，我正在讀他最近完成的《周易經傳疏解》這本書（應該可以說是集他一生研究之精華吧！）。他老人家一聽，精神又來了，馬上把在書最後的綜論裏的幾個重點跟我說了一遍。雖然我無法繼承他的學問，我想讓他知道，我會以我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他的學問。同時我也知道，他不只是在做學問而已，而是真心地希望我們這個民族，能從傳統的經典裏，找到對這個時代種種問題的因應之道。其實這個時代的種種問題，已經不只是對某個族群或某個地區、一個人或一群人要如何在地上過得更好，仁與義而已吧！

爸最後寫這本書，用心良苦。他的愛心，不只是對於自己的家人或族群，而是

對於全人類及其後代子孫。他平時跟我談的點點滴滴，是我自己的《論語》、孔、孟，是我自己的「聖經」。我知道自己的毛病很多，也常犯錯，可是我有這樣一本「聖經」在心中，讓我還不至於迷失。

對傳統經典的研究及活化，尤其是《周易》經傳、《詩經》，是爸學問的精華所在。此外，他有時也會提到從這個傳統發展出來對其他地方（比如說文學方面）的影響。我喜歡聽他講《文心雕龍》的那個「文心」到底是什麼。我也喜歡聽他講湯顯祖及他的老師羅汝芳。還記得有一次他和我及我表弟談「至情」。他說，西方人有殉情，能因情為對方而死，好像很崇高。不過他說，這還不夠，這還不算至情。湯顯祖講至情，是要能死而復生，才能叫至情。他沒細說怎樣才能死而復生，要我和我表弟兩個「理工男」自己去想。我很後悔自己那時沒強迫他講答案，不然我現在就可以用上了。

用情要用到超越生死，真的是談何容易！有的情因為隔了一層空間就無法繼續了，更難的是要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要怎樣才能讓一個人永遠活在自己心中？你看到什麼事情，你會想到他會怎麼看？你去做什麼事情，你知道他會怎麼做？我聽說金庸的《神鵰俠侶》原本是沒有楊過、小龍女兩人十七年後再在一起這一段的，因為已經是至情了，所以形體沒有必要。不知道這是不是爸的意思，我想我會去問我心裏的他。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湯顯祖《牡丹亭》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給爸爸的一封信及感懷

戴祖寧*

親愛的爸爸：

您近年來常說，生命到了現在，像是風中的燭火。這幾天，媽媽和我們，多想將這燭光捧在手心，小心呵護，替您抵擋這場風暴。多希望，就算是一點點火苗，也會慢慢、慢慢壯大起來！因為在我心中，您一直是光明的火炬，熱烈地燃燒著自己，照亮我們，引導前行。

這幾天我常想起，在那還只有我、媽媽和您的時光。您是不是也記得？我記憶中第一個家，丙三號，小小的房子只有一間臥室，每天晚上我要和您們道過晚安才睡。這習慣在我們家一直延續了好久。一家人彼此道著晚安，一起入夢。記得我和您們去淡水鎮上看電影，人太小，就坐在您們中間的椅背上，感覺好幸福。每次下山，總要爬克難坡，才能回到淡江山上的家。山路上、月光下，您抱著我，用麗水家鄉話唸著童謠：「月光光，光亮亮，大姊回去望親娘，親娘叫我心肝肉。」我們，就是您的心肝肉！小時候，您們就是我的全部，我和弟弟也是您們的全部！我們沒有祖父母在身邊，也沒有外公、外婆。我知道，您們將所有的愛，都毫無保留地傾注在我們身上。我多麼希望我還能有機會，可以好好的回報您的愛！

上次回到淡江，老宿舍早拆了，家門前那棵老松樹，倒是依然頑強地站在那裏。媽媽像看到老朋友似地說：看那桀傲的怪樣子，就是它，錯不了！這裏就是我們以前的家！

爸爸，我好想您！我好想回到我們的第一個家，在睡前抱著您道晚安，聞著您身上髮油和香煙的味道，安心地入睡。將殘的燈火，祂不吹熄。爸爸，我會繼續看

* 戴祖寧，戴璉璋教授長女。

守您的火苗。老爸，晚安！

女兒 祖寧上

這封信，是寫在爸爸離開我們的前幾小時。那天晚上，在加州家中的我忽然被一種巨大的悲傷籠罩，一個星期以來緊繃的情緒終於潰堤，感覺爸爸可能要離開我們了！心中非常非常的不捨，許多童年往事，以及與爸爸相處的時刻一下子湧上心頭。我就把心中的思念寫下，希望能夠想辦法送到爸爸的病床邊。老公看到我傷心，用〈腓力比書〉4:6的經文安慰我：「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他並且問了一個我覺得有點奇怪的問題：妳相信這世上有神嗎？我哭著說：「我信。」

接下來發生了許多的事情：先是發現我們將沒有辦法在隔離的時候出關探訪。接著媽媽說，爸爸打電話告訴她，他好累好累。然後在早上七點左右，我在睡夢中被喚醒，媽媽在電話中和我們一起做了最艱難的決定：放棄急救，讓爸爸平安的離開。我坐在窗前，任由悲傷的淚水淹沒……很奇妙的，在這時我的幾位好朋友幾乎同時來詢問爸爸的情況，得知消息之後就打電話來安慰我。一位主內的姊妹和我一起做了一個禱告。在八點半左右，我強打起精神開始準備一天的工作。就在我喝著咖啡，想著該如何面對這一天時，從廚房的窗口望出去，我看見了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景象：在我們鄰居後院的房頂上，側面立著一隻蒼鷺(heron)！它悠然地彷彿單腳站在屋脊，時而伸伸翅膀理一下羽毛，顧盼自若，不像是在覓食，也不急著離開，好像在休息準備下一次飛行。它的姿態讓我想起了國畫中的鶴。在中國人的觀念裏，鶴代表吉祥長壽。我的直覺是爸爸來跟我道別。我覺得這真的太奇妙了，於是用手機記錄下來，那時是八點五十五分。它共停留了大約一個小時才飛走。後來我發現，爸爸是在臺北時間一月八號凌晨一點十六分離開的，那時加州時間是一月七號早上九點十六分。

到了臺灣之後，我有機會和爸爸的高足月惠談到爸爸離開那晚上的事。當時時間已晚，媽媽已經沒有力氣再跑醫院。月惠聽到消息，就到至善安養中心拿了爸爸的衣服去醫院。她告訴我，她在爸爸離開之前為他頌唸天主教《玫瑰經》。她原本以為沒有趕上最後一面，但是後來發現，她趕到病床前的時候是一點十二分，爸爸還沒有完全離開。後來她替爸爸扶棺，在〈奇異恩典〉的歌聲中移靈至二殯。我也

將我見到蒼鷺的事告訴月惠。她告訴我，爸爸是在快兩點（加州時間十點）的時候從加護病房移到太平間，也就是說，我在加州看到蒼鷺的時候就是爸爸在加護病房彌留的最後一段時間。我們一同感謝神。也彼此從這事中得到安慰。她說她一直自責自己做得不夠好。但是我告訴她，她做得非常好，我們非常感謝她替爸爸，替我們所做的善行。我覺得就是因為有她的祝福禱告，才讓我能夠看見蒼鷺，而且這件事是掌握在我們天上的父的手中。爸爸的最後一程由月惠來陪伴，也應該是神的意思！爸爸非常有福氣！我們也非常有福氣！因為我相信將來我們都會再見面！我終於知道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麼了。

《新約·腓力比書》4:6-7：「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Different Countries, Same World

Christopher Tai (戴天惠)*

When I think about my grandpa being young, my head starts to hurt. To me, he had always been the elderly man who, with all his wisdom, taught me Chinese Chess, ate tart orange papayas, and called my brother and me *xiao jia huo*, little fellows. I was aware that his life was far more vigorous and extensive, but to me it just didn't seem real; I couldn't associate the unbelievable stories that I heard with the man who went on sunrise walks and took us to dine at expensive places. I couldn't comprehend the depth, veracity, and reality of his life until I watched a slideshow depicting it, the one made for his funeral.

I saw the pictures of him working on a train in Taiwan, when he didn't have anything else, after he had just lost his home and his family. At first, the black and white palette cast a hollow shadow over his early life. It reminded me of those pictures in history textbooks, the ones that make you wonder how anyone could possibly have lived "back then," how happiness could possibly have penetrated that colorless landscape. But then I saw that there were always other people populating the frames, sharing the same shabby work clothes, the same weary frowns, the same determination to fend off misery and loneliness. They didn't appear in the slideshow, but I imagined pictures of laughter forming an umbrella against sweat, of friendship filling the edges of that colorless world.

Fast forward, and the pictures exchanged black and white for color, grim and grime for grins, ambition for success. In these pictures, he was shaking hands with important people, giving important lectures, attending important events. At first, I felt uncomfortable, like I was prying into a secret, like I was glimpsing into a world I didn't

* 戴天惠，戴璉璋教授之孫。

belong in. In reality, it was hard to rationalize the photographic evidence of my grandpa's importance because he had always just been *my* grandfather, a part of *my* personal life remov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ut he had a prominent impact on others, too. That was undeniable.

It filled me with joy but also sadness to see the pictures of him and my grandma, younger then and full of the love that holds strong until this day. I didn't think he could smile so widely, with the corners of his lips touching the edge of the picture frame. I didn't think his world could twist in on him and turn three-hundred-sixty degrees the way it does when one is in love. But it must have. That's how love works.

And then there were the pictures where he held my dad, still a boy. I didn't know my dad *could* be a boy. I didn't know he could gather his legs in someone's lap, tiny hands reaching toward imagination, twinkling eyes gazing far into the future. But there he was, looking ready to leap out of the screen, looking exactly like the pictures of *me* around the house. Seeing those pictures made me realize that, even though my dad called him *yeye*, grandpa, in front of me, he had really been to my dad like my dad was to me. It was terrifying, the realization that my father had just lost his dad.

But the pictures that scared me the most were the ones at the end, the ones where I was in the frame, dated only a few years back. Because everything had been fine then. Because he had still been here, and I had not cherished it enough.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戴璉璋先生對中國文哲研究所的貢獻

李明輝*

我於一九九一年到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以下簡稱「本所」）服務。戴璉璋先生則是於次年接任本所主任，五年之後卸下行政職務，繼續擔任研究員，直到二〇〇一年滿七十歲退休為止，前後共計十年。因此，我與戴先生在本所整整共事了十年，可謂有緣。說起來，我會到文哲所服務，與戴先生有關。本所於一九九〇年成立，次年開始招聘研究人員。當時戴先生是本所設所諮詢委員，而我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由於本所需才孔亟，戴先生便鼓勵我申請本所的研究職務。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便提出申請，很順利地通過了學術審查，成為本所的副研究員。

一九九一年我初到本所服務時，主任是吳宏一先生，而本所尚在草創階段，百廢待舉。當時本所並無自己的館舍，而借用本院郵局旁邊兩層樓的動物所舊館，而且人員也不多。次年吳先生因故辭職，由戴先生接任。

戴先生剛接任主任時，首先面對的重大任務便是永久館舍的興建問題。在吳主任時代，院方原先打算將總辦事處對面的舊化學館改建為本所大樓。吳主任也委託了一位建築師畫了設計藍圖。戴先生接任主任後，發現舊化學館的面積過小，便向院方爭取到目前的現址。這樣一來，設計藍圖必須重畫。原先規畫設計藍圖的建築師是個借牌的建築師。我向戴先生表示：此事不妥，因為萬一未來出現法律問題時，責任很難釐清。我建議改請李祖原先生設計。由於李先生對牟宗三先生的尊崇，他立刻答應為本所設計新館。

本院的體制與各大學不同，因為本院各處所都是獨立的行政單位。大學的院所要興建館舍，一概由總務處負責。本院的處所要興建館舍，則必須自行負責招標、設計、監工等行政工作，這是非常沉重的負擔。戴先生慨然承擔起這個責任。本所

*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大樓的興建工程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開工，一九九五年七月竣工，前後不到兩年。施工期間戴先生任勞任怨，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這座大樓在驗收時是零缺點，隨即獲得一九九六年「建築師雜誌佳作獎」。事後承包工程的包工表示：在整個施工過程中完全不見在他處常見的收回扣等陋規，令他們非常驚訝而感佩。

如果說：興建大樓是戴先生對本所的可見貢獻，他還有一項無形的貢獻，即對客觀學術標準的堅持。戴先生上任之初，即考慮本所未來的研究重點，有意推動一項大型的主題研究計畫。他特別找來當時任本所設所諮詢委員的劉述先先生商量，我也參與其事。當時我便建議以「當代儒學」作為主題研究計畫的重點。一則因為戴、劉兩位先生與我的專長都與當代儒學有關，再加上本所研究中國哲學與經學的同仁，本所的人才在這方面有明顯的優勢。再則臺灣的儒學研究一向偏重於傳統儒學，較少措意於當代儒學；以當代儒學為研究重點，可突顯其現代意義，展現新意。另外還有一項附帶的理由：中國大陸自一九八六年起將「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列為國家重點研究課題之一，由方克立與李錦全擔任課題負責人，總共網羅了十六個學術單位的四十七位學者參加。由於政治意識型態的限制，大陸學界過去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貧乏。但他們的人力充沛，一經動員，很容易形成局部優勢。如果臺灣學界再不重視當代儒學的研究，很可能會喪失發言權。戴、劉兩位先生完全贊同我的建議。於是我們便開始規劃一個三年期的大型研究計畫，以「當代儒家對時代問題的回應」為主題，由戴、劉兩位先生共同主持，我則負責協助的工作。

不料一九九三年我們向院方提出研究計畫時，卻遭到了阻礙。七月十六日這項計畫被提到本院學術諮詢總會委員會議討論時，何炳棣院士強烈反對通過這項計畫。他認為這項計畫是要研究當代新儒學，而當代新儒學「根本不是個學問，而是製造出來迷惑人的一種新的宗教」。其實我們的研究是以問題而非學派為主，後來的成果也證實了這點。何炳棣本人是史學家，但對哲學卻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偏見與反感。這還涉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何炳棣在香港期刊《二十一世紀》發表〈「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探討〉而引發的一場辯論。何炳棣藉著批評杜先生，全面否定當代新儒家的學術成就。後來劉述先先生也加入辯論，為杜先生辯護。因此，他反對「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實有挾怨報復之嫌。當時我在場聆聽戴先生的發言與何炳棣充滿情緒、口不擇言的批評，實在非常感慨。所幸在場的丁邦新與余英時兩位院士也仗義直言，為這個計畫辯護。或許是為

了讓何炳棣有個下臺階，最後決議先讓這個計畫執行一年之後再做檢討。計畫開始執行之後，何炳棣所指控的事情並未發生，計畫就順利進行下去，一期接一期，前後進行了十幾年。由此可見，戴先生上任時所面臨的是多麼艱困的學術環境！

此外，本所當時正在發展，亟需徵聘新人。因此，戴先生堅持建立一個客觀而公正的聘任制度。當時有一位知名人士有意來本所任職，但他不循公開的制度提出申請，而是通過本院高層走後門。但戴先生堅持客觀的審查制度，照章辦理。結果那位人士沒通過審查，竟然到處放話，說新儒家打壓他。這兩個事件都顯示戴先生對客觀學術標準的堅持，也為本所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學術傳統。

戴先生從本所退休已二十年了。本所目前的大部分同仁都未與他共事過，故未必了解他在本所籌備之初的奮鬥與貢獻。明年我也將從工作超過三十年的本所退休。如今在戴先生辭世之際陳述這些前朝遺事，以示追悼之意。今天本所的同仁在享有如此完善的研究環境時，實應記得前人種樹的功德。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鈴鐺與鐘聲——懷念戴璉璋老師

胡曉真*

接到瑋芬電話告知戴老師在醫院過世的消息時，我正在朱銘美術館參觀。顧不得周圍遊人的眼光，不覺淚水雙流，甚至嗚咽起來。傷逝之情，當然首先是哀痛逝者大去，但更痛的總是自己生命的某些部分會因此而重新經驗一次。在接到那通電話後，過往二十幾年與戴老師相處的記憶，瞬間錯雜地在腦海中出現，每一個閃現的畫面都牽連著我個人生活與學術生涯的重要時刻。

戴老師於我有知遇之恩，若非戴老師的提攜，我可能無緣進入臺灣學術界吧！這一切也是起於一通電話。我在哈佛東亞系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後，正在考慮是留在學校，還是回臺灣寫論文。正所謂初生之犢，我聽說中研院籌備設立中國文哲研究所後，馬上把履歷、單篇論文等資料寄過去。沒想到，不久後就接到當時擔任文哲所籌備處主任的戴老師親自打來的越洋電話。他鼓勵我努力完成論文，才可正式申請，並且建議我先到文哲所擔任研究助理，一面工作一面寫論文。在這個機緣下，我便回到臺灣，開始在文哲所工作。可以說，那一通電話決定了我的生涯規劃。來到所裏，戴老師交給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葉嘉瑩教授訪問期間的「隨扈」。第二份工作是傳寫饒宗頤教授的講演。第一份工作像是跑腿，但其實戴老師說了，他希望我藉這個機會近身學習葉教授治學與為人的風範。第二份工作頗讓我吃了些苦頭，因為饒教授說話口音較重，講演內容又離我所學較遠。於是我守著錄音機不斷重播，經常陷入焦慮或沮喪。幸運的是圖書館就在旁邊，隨時可以去查資料。如此痛苦掙扎了許久，最後成篇可能還是不能盡如人意，但也頗有成就感。回想起來，戴老師指定的工作，用意更在於訓練一個初進學界的年輕人，而當事人雖然只是奉命完成工作，受益卻極為長遠。前輩學者之「用人」，不是「使用」，而

*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是成其所用，我由此深有體會。所謂栽培後進，戴老師真是特別用心。文哲所定期推動主題計畫，這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工作。當時我們仍在籌備處階段，主任的決策可謂影響全局。在成果輝煌的明清戲曲主題計畫告一段落後，戴老師竟指定我與若芬、苑如三個新進的助研究員構思下一個主題計畫。這是多麼大的信任！試問當時的年代，臺灣人文學界哪個機構會給經驗不足的年輕學者這樣的機會？「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背後的推手是戴老師，這不但讓我們三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獲得了最好的訓練，也為文哲所樹立讓年輕人出頭的傳統。

進入文哲所後，我並沒有時時親炙戴老師的指導，畢竟我是一個新進人員，而戴老師是主任，又是大家敬仰的大學者。不過，不論是學術工作或為人處事，我感受戴老師都是以親身實踐的方式帶領我們。他是一位真正的儒者。有一位中學同學是師大（現在的臺師大）國文系畢業的，聽說我們的主任是戴老師，就替我發了一陣抖。她說，以前去旁聽戴老師的課，看見戴老師講課沒有一句廢話，凡是沒預習而答不出問題的同学，都得站著！「好可怕！我旁聽了一節課就溜了，實在沒有膽子修那門課！」我聽了覺得好笑，因為平常接觸的戴老師，要言不煩是真的，不怒而威是真的，但我從來沒見到戴老師嚴厲的樣子，他還歡心樂意地當我的證婚人呢。跟戴老師更親近了些以後，我壯起膽子問他這故事是否屬實，戴老師作委屈狀，說：「我可沒有罰他們站！是他們自己覺得有錯，於心有愧，不好意思坐下。我忙著上課沒注意他們還站著呀！」後來，聽學界朋友說，他們當時修戴老師的課，因為老師要求嚴格，學生上課前一天甚至會緊張到拉肚子或睡不著覺，但是課堂又那麼充實、那麼精彩，怎麼能不愛戴老師的課呢？又嚴格又讓學生敬愛，真是教育家的最高境界。戴老師帶領文哲所，面對的不是學生，而是不同資歷的學者，即使對我這種小輩，也總是非常尊重，罰站那一招是肯定用不上了。但是他的嚴謹、遠見、無私、寬厚，對我們個人與對文哲所的風格，實在影響深遠。戴老師為我們打下的基礎，至今仍是文哲所最好的一面。

當時戴老師在文哲所栽培了一群年輕學者，大家私下的感情非常好。因為所裏提供了公用的空間，我們便總是趁午休時間聚在一起，無所不談，有時為了一個小問題可以辯論一小時，歡笑喧嘩，盡情騁懷。問題是，這個公用空間在文哲所二樓行政區旁邊，戴老師的主任室就在走廊盡頭。有時，其中一人會突然打個機伶，提醒大家稍稍收斂，戴老師剛剛從旁邊經過啊！只不過我們收斂聲量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分鐘。又不知有哪個促狹鬼出了壞主意，說古人配玉，我們可以送戴老師一個

漂亮的玉佩加鈴鐺，他走近我們能聽見鈴鐺聲，這就來得及趕快降低講話的音量。眾人為之絕倒。其實，戴老師可能也想加入我們吧？下面這件事可以證明。某個春天，愚人節快到了，這次又不知哪個點子王出的主意，說是現在追求跨領域，我們要轟動萬教的話，就舉辦一個愚人節研討會，大家都去寫跟自己形象離得最遠的題目。例如，最恨英文的那個，就寫「英語教學之我見」。我得到的題目則是「論良知的自我坎陷」。我們竟然歡得連戴老師都編排上了，既然所有題目都要反著來，就給他訂題目為「論《肉蒲團》」。不但如此，這麼犯上的事兒，我們還敢搬到戴老師面前說給他聽，而戴老師聽了，睨了我們一眼，冷靜地說了一句：「你們真的以為我不會寫嗎？」這樣的戴老師，教我們如何不愛戴呢？研究人員之間情誼深長，在學術與生活上彼此支持，真心喜愛我們的研究工作，信任主管以大公無私的精神帶領同仁，並重視我們的意見，這樣的氛圍是文哲所之所以為文哲所，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而這些正是戴老師在任內為我們塑造出來的。

戴老師榮休以後，從市中心移居風景優美的郊區，因此也很少回到所裏來，但他的研究工作完全沒擱下，在我們心目中他也始終還是大家長似的。二〇一二年年初，我在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接任所長一職。所內的前輩們都為我擔心，我也覺得自己資歷尚淺，恐怕不足以當此重任，於是抱著尋求秘笈與心理支持的心情，到戴老師與師母恬怡養生的山莊拜訪。戴老師忙上忙下，為我們幾個人準備茶水，我們心裏好生不安，但也看得出他其實相當歡喜。在戴老師冷靜理性的分析與溫暖撫慰的鼓勵下，我的心也安定下來。有一次古典文學同仁邀請戴老師回來演講，那天講的是他的「近期最愛」劉彥和，看著戴老師討論學術時眼中的光芒，嘴角的笑意，那對研究工作的熱愛深深感染了我們，相信當天在場的同仁都還記得。戴老師又曾在政大中文系與臺灣中文學會合辦的會議上發表《文心雕龍》的研究，那麼清晰的思路，那麼宏大的格局，那麼動人的風采，全場聽眾都為之折服。會後大家搶著與學術偶像合照，我費了好一番功夫才在畫面中搶到一個位置呢！除了《易經》，戴老師近年有兩個最愛——馬一浮與劉彥和，那些論著能不能整理成書呢？

我受了戴老師這麼多栽培與照顧，可曾有過回報？是否有負託付？反省自己，不覺汗下。懷念戴老師的時候，我會特別記得幾個小小的時刻，對戴老師可能不重要，對我卻是記憶中的暖流。回國後第一次在主任室見到戴老師的時候，戴老師榮休會上我緊張地為他別上胸花的時候，在自宅以生疏的廚藝招待戴老師的時候。最永銘於心的時刻，則是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與貞德、大興還有負責《周易經傳疏

解》編輯工作的聖堡，到陽明山的至善安養中心拜訪戴老師。戴老師只知道聖堡要來取書稿，並不知道我們也跟來了。他走進大廳，看見我們的那一瞬間，臉上猶如陽光下花瓣徐徐漾開，一句：「哎呀！怎麼是妳！妳怎麼來了呀！」讓我深深自責怎麼不常來探望老人家。那一天，就在至善安養中心待客區，戴老師為我們講述最近的研究心得，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像發表了一篇完整的論文，條理分明、遣詞精確、思考深厚都不在話下，最動人的還是戴老師對文化傳承與年輕世代的期待。我的手機錄音記下了戴老師關於《周易經傳疏解》一書的話：「我自己認為，給年輕人：你如果要把文句讀懂，我這個書，替你整理出來了。如果你要建構思想，我不會拿我的了解去籠罩你。我，只是告訴你，這部經本身，它在思想方面可以整理出來，大概是個什麼樣的形態。我還是比較忠實地反映《周易》經傳原典的內容。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二十多年前想給戴老師繫鈴鐺玉佩的那些促狹鬼，現在都算是資深學者，甚至已經退休了。在文哲所這一代研究人員的學術歷程中，戴老師的影響是非常關鍵的。他的學術精神與人文懷抱，其實是振聵發聵的鐘聲。願這清奇堅定的鐘聲，成為文哲所學術追求之路的傳承，繼續在每個文哲人的心裏迴響。



2020年7月9日文哲所同仁在陽明山至善安養中心與戴老師歡聚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相遇在生命轉折處 ——追憶戴璉璋老師

林月惠*

似乎從二〇二一年歲末以來，濕冷的天氣一直瀰漫在北臺灣的天空，直至二〇二二年的清明時節，是極端氣候所致？抑或傷逝生命的別離？戴老師辭世已近百日，有時覺得恍如夢中，一切來得太匆匆；有時回到現實，找到與戴老師的連結，滿是懷念與感恩。

生命的許多故事，總有些意想不到的邂逅，猶如一粒種子落地，何時發芽成長，有時要若干年之後，也許才明白。戴老師之於我的學術生命，彷彿也是意外的相遇，可遇不可求，卻有定錨的作用，默默地發生影響力。我雖然於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就讀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但那期間戴老師卻赴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研究，儘管我錯過正式上戴老師課程的機會，卻幸運地親炙牟宗三先生，領受當代新儒家的學術慧命，奠定日後學術研究的基礎與方向，受用至今。實際上，早在我就讀臺中師專期間，就獨自摸索當代新儒家諸先生之學，先喜唐君毅先生論中國文化之精神，頗覺契合於心；由此溯源於熊十力先生，對於海水與眾漚之喻，反覆沉思。後又迷上徐復觀先生之論學術與政治、論中國之藝術精神，時有感動與興發。然而，令我感到距離最遙遠、最難以理解的就是牟先生的學問。而將這一距離彌合，關卡打通的人就是戴老師，我為此終生感念。

一九八二年我畢業於臺中師專，隨即北上任教於中和市興南國小。我忙於教學之際，也有繼續深造的意願。當時因要準備一九八五年的同等學歷報考研究所，故我必須在「中國哲學史」下功夫。雖然我也研讀勞思光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但戴老師所講授的「中國哲學史」卻系統性地開啟我承接當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先

* 林月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生)學問的契機。一九八四年,我鼓起勇氣到臺灣師大旁聽戴老師於國文系所開設的「中國哲學史」課程,我得知戴老師非常嚴格,旁聽生必須徵求他的同意才能聽講。上課前我向戴老師提出我的請求,戴老師打量我一番後,嚴峻地告知:「若要旁聽,則不能缺任何一堂課,否則就不要來了!」我也說明我的困難,每次上課我都會遲到十分鐘,因要配合小學生放學的時間之故。所幸戴老師能理解我的難處,從此我展開一年(每週三堂課)的「中國哲學史」旁聽課程。那一年的旁聽很辛苦,風雨無阻,卻也很充實,我終於挺過來了。戴老師講授中國哲學史時,緊扣文本原典,尤其先秦文獻,隨手拈來,得心應手;且概念辨析非常清楚,義理發展脈絡的講解,也前後呼應。戴老師因考量授課時間不足之問題,故先講授中國哲學史的整體思想圖像與中國哲學的特質,之後再按照時代先後而分論之。尤其先秦諸子部分,更是重中之重,因那是中國哲學史奠基之處。同時,戴老師也參照牟先生的諸多中國哲學著作的觀點,予以導引。因此,每次上課,臺上戴老師兢兢業業,臺下學生戰戰兢兢,又要聚精會神聽講,又要勤抄筆記,唯恐錯過任何一段的講授。然而,戴老師授課中的隨時提問,也是令人忐忑不安的。記得有一次講荀子,戴老師提問:「荀子言:『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之『偽』,當作何解?」隨即點名一位同學回答。也許那位同學太緊張了,隨口回答「虛偽」兩字。戴老師當下斥責,全班鴉雀無聲,空氣都似乎凝結了。結果那位同學就罰站了一整節課,沒有戴老師的允許,還不敢坐下。我坐在最後一排,汗流浹背,終於見識到戴老師的嚴厲。如此深刻的印象,當時聽講的學生,一定終身難忘,再也不會有人誤解荀子性惡論之所指了。後來,我聽戴老師令媛祖寧提及學生背後稱戴老師為「雷公」,實有所本,經戴老師雷霆萬鈞一棒,就足以聞風喪膽而有所醒悟。在這一年旁聽戴老師「中國哲學史」的學習過程中,彷彿打通了我對中國哲學史理解的任督二脈,也使我親近牟先生的學問,不再害怕,不再覺得遙不可及,似懂非懂。這對我隨後銜接牟先生那三年在師大國文研究所的授課,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嗣後,戴老師雖於一九八七年返回臺灣師大授課,但我因博士班轉至臺灣大學就讀,加上任教於嘉義師院等諸多因素,我再也沒有上過戴老師的課了。再次與戴老師相遇,就在我的博士論文口試中了。一九九五年六月我提交博士論文,戴老師時任五位口試委員之一,並任口試委員主席。那天的口試進行順利,我竭盡所能回應問題,但當最後一道問題回答後,我不禁激動地潸然淚下,久久不能自己,似乎驚嚇了所有的口試委員,頗為失態。口試之後,指導教授張亨老師囑咐我送戴老

師回金門街的住處，我才告訴戴老師為何痛哭之故。因口試至最後，所有人都模糊了，只有牟先生的身影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我告訴牟先生：「我盡力了，博士論文通過了……。」因為就在博士論文撰寫至最後階段，當年四月十二日牟先生驟逝，那段日子我是如何熬過來的，我都不知道。所有的悲傷與哀痛，強忍至論文口試完成那一刻而一發不可收拾……。因而，我告訴戴老師，我想到山上墓園去祭拜牟先生。那天下午風雨很大，戴老師沒有阻止我，微微點頭同意，只是不放心，要我找一位男同學陪我上山。新店山上墓園風雨依舊，我分不清淚水與雨水，靜靜地在牟先生墓園駐足一個下午，沒有喜悅，只有無盡的哀思。博士論文完成了，敬愛的牟先生卻天人永隔，生命的得失相倚，哀樂相生，慟何言哉！這一次，昔日旁聽的中國哲學史不再以客觀的知識呈現，戴老師也不再以嚴厲的形象出現，而是見證生命的學問、學問的生命！

第三度與戴老師相遇，始於我一九九九年任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終於戴老師晚年偕師母安居於陽明山至善安養中心的山居歲月。這二十多年的相處，從參與當代儒學研究計畫、編輯《牟宗三先生全集》、編寫與推展高中《中華文化輔助教材》，直至戴老師撰寫《周易經傳疏解》，開啟我另一段領受戴老師人格、處事、問學之旅。中國文哲所猶如戴老師所催生的學術之子，他極為珍視，也殷殷期盼它的成長茁壯。雖然戴老師於二〇〇二年就從文哲所退休，但對文哲所的關切，直到他辭世前都不曾稍減。學術的客觀性與人才的重視，是他關注所在。他與劉述先先生惺惺相惜，莫逆於心，攜手為文哲所而努力。多少年來，只要戴老師出現在文哲所，或是劉先生恰似日常地駐足於文哲所，就帶來一股安定的力量，他們如同文哲所的兩大精神支柱，默默鼓勵陪伴後學與研究同仁。戴老師深知中國哲學研究必須開放地走向世界，因此，他鼓勵年輕的研究人員離開舒適圈，出國進行學術交流，以期不辜負中央研究院如此優渥的學術研究環境。他對於新進研究同仁的研究，也有所留意。記得有一次戴老師要我影印一位新進同仁的論文給他細讀，並對其中有關《莊子·應帝王》「壺子四相」提出不同的解讀，強調文本解讀與哲學玄思之相輔相成。戴老師猶如文哲所的大家長，他深知每位研究人員的個性與才性之長短，或予以鼓勵，或予以針砭。面對所內偶有的緊張衝突，他都以「無欲則剛」處之，這是他從事行政工作所遵循的理念。有一位資深退休的研究員告訴我，「無欲則剛」是戴老師留給文哲所最可貴的精神遺產！也唯有這樣的精神，才能使文哲所成為一個能夠獨立而自由做研究的基地。

對我而言，文哲所與退休後的戴老師，不再是昔日初識時「望之儼然」的嚴厲形象了，而是隨時可以親近的長者。我的學術規劃，多與他商量，聽取他的建議。如我之從事韓國儒學的研究，就受到戴老師極大的鼓勵而全然投入。似乎他一九八〇年與牟先生的訪韓之行，為數十年後我的學術轉向鋪路。戴老師在師大所指導的梁承武教授，不斷為臺灣與韓國的學術交流付出心力，從上一代到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年輕學者，都受到梁教授的關照。文哲所由「當代儒學研究」到「東亞儒學研究」的發展，戴老師可能是最早的播種者，學術交流也有它主客觀的機緣，水到渠成。多年來，向戴老師問學中，最有收穫之處，在於他每每結合漢語語法與義理解析的精彩分析。許多義理問題，經由語法的解析，更具有說服力。如我在研究韓國儒學有關「物格」與「格物」的論辨時，因要觸及漢語與韓語語法結構的分析，故我乃以此問題求助於戴老師。就在他漢語語法的分析中，得以與韓語語法進行鮮明的對比，進而能恰當地理解韓儒李退溪晚年的「物格說」與「理到說」。又如羅近溪引用陸象山「能以身復乎禮」來解釋「克己復禮」，這樣的義理詮釋，戴老師也由語法結構的分析為我釋疑。戴老師認為，若要將「克己復禮」之「克」作能願動詞解，則必須解讀為「克／己復禮」，即「己」為主詞，「復」為動詞，意即：「能己復禮」，能夠自己復禮。戴老師結合漢語語法與中國哲學義理分析的看家本領，令我折服！因此，戴老師晚年完成《周易經傳疏解》時，特別向我提及，研究《周易》與先秦哲學，必須具備漢語語法、文字訓詁（金甲文）、哲學義理三種學養，他何其幸運，能師從許世瑛先生學習古代漢語語法，而文字訓詁之功則來自屈萬里先生之教導，且中國哲學義理又有牟宗三先生的啟迪。由此可見，戴老師晚年《周易經傳疏解》一書，正是他一生學問功底之融會綜合，絕非一本普及化的經典疏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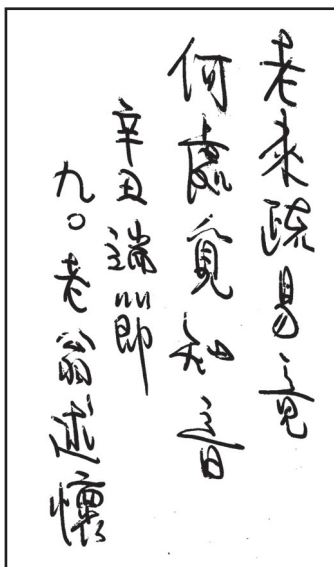
戴老師治學的嚴謹與任事之擔當，也表現在我們一起編纂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輔助教材的實務工作上。二〇一一年，戴老師得知經陳水扁政府廢除的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將恢復為兩年四學分的必選學科，乃召集幾位弟子共商如何編纂一部落實「在地化、時代性與實踐性」的輔助教材，將經典活化而轉為實踐智慧，並為中華文化紮根播種。在諸多考量後，我們乃邀集文、史、哲專家學者，以及第一線高中教師共同攜手合作編寫教材，參與者約有六十位（大學教授與高中老師各半）。然而，當時輿論有所反彈，或謂教育部此舉「違憲」，或謂違反「政教分離」，或謂經典是現代科學的牢籠與意識形態的束縛。戴老師乃投書報章呼籲：

「筆者誠摯期盼：教育部相關的主事者能審慎地聽取反對者的聲音，而站在第一線的高中國文教師及文化基本教材的編撰者們更要牢記反對者的疑慮而心存警惕，不要沉淪到他們所說的流弊當中去。但願有心人士共同努力，集思廣益，讓這套教材生活化，貼切於年輕人的情懷；讓這科教法多樣化，引發出年輕人的志趣。個人認為這是目前我們當做而且必須做好的大事，斷斷於口舌之爭，恐無益於實際。」戴老師指揮若定，他要我們安心編纂教材，他則與其他資深老師在前線回應輿論異見，當仁不讓！

戴老師向來以承擔來落實理想，他的構想是一整套的，不僅要有好的教材，也要進行教法的更新活化，還要進行教材教法的實驗與推廣。因此，從編審小組、編輯小組到文教資源中心的運作、種子教師的培訓、輔助教材的實驗計畫，戴老師皆提供實際可行的建議。尤其，戴老師以他之前編輯國中國文教科書的豐富經驗，從單元的設計，到經典文本的詮釋解讀，帶領編輯小組成員，字字句句，詳加斟酌。每次開會大多費時一整天，戴老師以八十高齡參與討論，不以為苦；每次會後，都要休息數天才得以恢復體力。這樣的精神感召，感動並鼓舞每一位參與者。此「《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輔助教材編纂計畫」自二〇一一年五月開始，為期三年；而輔助教材的實驗計畫也隨之進行多年。先由臺大中文系徐聖心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謝大寧教授與我擔任協同主持人，後由臺大歷史系閻鴻中教授接續計畫主持人而竟其功。然而，我們辛苦編輯出來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輔助教材，卻因教育部無法落實編輯者開放著作權的心願，至今仍無法廣為流傳，殊為可惜。這期間，從編輯教材到推廣教材，加上政局的更迭，歷經諸多困難，也耗盡我數年的心力。戴老師得知其中艱辛，總是安慰勉勵：「盡心盡力了，就無愧於心，缺憾還諸天地。」這是戴老師豁達的智慧！

戴老師豁達的智慧，渾然體現於晚年的山居歲月中。二〇一七年五月，戴老師與師母由木柵軍功路搬遷至陽明山至善安養院。由於我之前來往於此安養院多年，熟悉安養院的環境與運作，故向戴老師推薦。也許因這特殊緣故，我得以常常出入安養院。或與戴老師、師母話家常，陪他們於餐廳吃大鍋飯；或與戴老師談學問、論時局；或為師母跑跑腿，準備日常生活所需，一如家人般地自在，戴老師與師母也無招待外人的心理負擔。前幾年，戴老師陪師母前往臺安醫院就診，過馬路時因路人之碰撞而不慎跌傷；由於未能及時就醫，導致腰椎受傷數月，疼痛不堪，自此元氣大傷。雖然如此，戴老師安之若命，安然接受與腰痛共處的不適，也積極

復健，並在師母悉心的調養下，戴老師開始他最後一部著作《周易經傳疏解》的撰寫。他深感時不我與，不願分散心力與體力，故婉拒諸多師友的探望。為使著作之撰寫順利，文獻資料查閱之方便，我建議時任文哲所博士候選人的羅聖堡博士協助戴老師，包含後續出版事宜，此建議也得到所方的大力支持。記得二〇一九年十月我赴比利時訪學前，戴老師很興奮地告知，已經疏解三十幾卦了，期盼我二〇二〇年返臺後，他可以完成此書，了卻最後的著述心願。孰料二〇一九年年底，爆發 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至今仍未平息。雖然疫情變化莫測，但因師母無微不至的照顧，戴老師於二〇二〇年七月底終於完成書稿，並進入送審的程序。戴老師幽默地謙稱：「書稿總算交出了，這是閉門造車的成果，希望所內能作嚴格審查，別因而留一污點。疫情時局及地球都在劇變，而我卻兩眼朦朧守著一部古經自說自話，自覺可笑！但命運如此，又能奈何？」事實上，值此疫情嚴峻、世局不靖之際，戴老師幾乎將疏解《周易》視為他的天命，他以活化經典的使命自期自許，守護的是中國哲學智慧經典的傳承！之後，在等待送審結果的冗長過程中，戴老師堅持於二〇二一年五月完成書稿修訂付梓後，才肯住院接受六月初的心律調整器手術。他將此書的出版，看得比他的身體健康還來得重要！我看著他端午節隨手寫在小紙片的心聲：「老來疏易竟，何處覓知音？」感到學問與生命的莊嚴。戴老師蒼勁的字體，簡短數語就體現了儒者「居易以俟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真諦。他不僅以著述活化經典，也以生命見證經典的智慧！



原以為戴老師換了心律調整器後，心臟宿疾的威脅就解除了，等疫情過後，我又可以上陽明山向他愉快地問學。因此，自《周易經傳疏解》出版後，我於二〇二一年七月開始，委請羅聖堡博士帶領，成立線上「《周易》讀書會」，每兩週一次，邀請對《周易》有興趣的師友參與，其成員包含臺灣、中國大陸、韓國等地區的研究生與年輕學者，也有退休的研究員共襄盛舉。每次讀書會的討論，皆有詳盡的紀錄，大家非常投入。戴老師得知後，頗感欣慰，也告訴我，經學與中國哲學研究的對話、互濟，是他對文哲所發展的期待之一。我想，「《周易》讀書會」可以締造一個戴老師所期待的學術平臺。幾個月之後，戴老師希望看看讀書會的紀錄。令

每一位讀書會師友感動的是，戴老師於十月就親自寫了十五頁的回函給所有讀書會成員，鼓勵大家，也為大家釋疑解惑。戴老師以其身教與言教，印證了「學不厭、教不倦」的人師典範，我們永銘於心，默而識之。

最後一次與戴老師的相遇，竟是在生死關前，帶給我無比的生命震撼！去年歲末，寒流來襲，戴老師因心臟無力而導致肺炎積水，於一月四日緊急住進振興醫院，隨後轉入加護病房。但一月七日我陪同師母探望戴老師時，他雖感無奈，卻思路清晰，一如往昔，問及我的研究與「《周易》讀書會」，絲毫看不出病危之容貌，醫師也樂觀以對。怎料晚間十一時病情急轉直下，於八日凌晨溘然長逝。我在驚慌失措中向戴老師叩首而道愛、道謝、道歉、道別。我也驚訝師母為戴老師所準備的衣服是如此莊嚴：質樸的白色襯衫，配上深藍色毛衣與長褲，非常安詳，宛如生前，是「即之也溫」的儒者形象！永銘我心！面對死亡，任憑我如何準備，我仍是軟弱的、驚慌的、措手不及的！反而老師是如此平靜、安寧——「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載〈西銘〉）二〇二〇年我在比利時面對突來的疫情而孤立無援時，戴老師教導我要「定、靜、安、慮、得」（《大學》），這是戴老師對我最後的教導。而今，這一生死學分，我還是不及格，還要重修、補課。在追憶戴老師的這些日子裏，我常反覆思忖身為儒家信仰實踐者的戴老師，他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如何看待？回歸何處？後得知戴老師喜愛諷誦馬一浮臨終詩的兩句：「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我似乎有所憬悟。戴老師以有限的生命，開啟通往無限的圓滿之路，無憾於天地間，何其簡易，何其險阻，何其不易！

冬寒已逝，春天來了，長眠於陽明山臻善園的戴老師，已經跨越生死門檻，縱浪大化中了。令我感到奇妙的是，戴老師辭世的百日，竟是今年的復活節！我為戴老師所祝禱的「永恆的安息」，在此神奇的記號中，得到無比的安慰：死亡不是終點，而是永生復活的入口；薪盡火傳，生生不息！這真是奇異恩典啊！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追憶戴璉璋先生

鍾彩鈞*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我與林慶彰先生是第一批聘入文哲所籌備處的研究人員，戴先生是設所學術諮詢委員，那時認識了戴先生，至今已三十二年了。民國八十一年，吳宏一主任因眼疾辭職。戴先生以設所諮詢委員之尊，六十悠遊之年，毅然接下籌備處主任一職，直至民國九十年以七十高齡退休，其間我們有十年同事之誼。我在民國八十五年上半年因為戴先生赴新加坡講學、八十六年六月又因戴先生年滿六十五歲不能任行政職（後來有放寬），兩度代理主任，直至九十一年六月正式成所為止，因此在行政上是戴先生的繼任者。九十五年二月至一〇一年二月我又擔任所長，仍然常向戴先生請益，對戴先生的為學治事自然有不少認識。鑑於戴先生的經歷、事業、學問已有許多敘述，小文就略寫記憶中的一些點滴，或者能為戴先生的人格風範再添幾筆鮮活的印象。

戴先生的學術事業，除了多方面的學術成就外，中國文哲研究所的建設尤為晚年最大勞績。依中央研究院的規定，新研究所須先設立籌備處，其任務是在設所學術諮詢委員會的規劃與審查下，逐年聘請研究人員，推動研究計畫，並建設研究大樓與圖書館等硬體設施，也就是從零開始，直到人員、設備、成果都有令人滿意的規模，再經中研院評議會的決議，才能正式成所。文哲所籌備處時期從民國七十八年八月至九十一年七月，歷時十三年。戴先生主持了其中最重要的五年，其間不但人員徵聘與研究方向基礎底定，發展快速，更重要的是文哲所大樓的興建，對一個讀書人來說，這是最困難最偉大的功績了。這工作歷經首任主任吳宏一老師、代理主任林慶彰與繼任主任戴先生才告成。我雖處其時，只知道一些梗概。這是因為雖然成立了建築委員會，研究人員都包括在內，事實上，戴先生帶著榮智明、林

* 鍾彩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耀椿兩、三位職員，一肩挑起所有相關的交涉、監工、行政等事務，讓我們在草創時期仍能夠安心研究，令人銘感在心。關於建築，值得一提的是用地的取得。最初院方給我們總辦事處對面的草地，然而面積較小，不久院方又表示將作他用，要我們另尋建地。慶彰兄適時發了一頓脾氣，大概是說他沒有能力找地，文哲所不必辦了。院方這才盡力協調植物所，將四分溪旁一片竹林讓給我們。那片地在地圖上看是一小塊，其實是舊時測量不精確的關係。當時戴先生剛接任，便去實地考察，東看西看，總覺得比地圖所繪大得多，連忙面露委曲地接受了。文哲所幾乎是院內所建的最後一棟「透天厝」，以後成立的新所，只能在「人文社會大樓」中分得兩三層了。建設工程，李明輝先生建議找李祖原建築師規劃。李建築師以天圓地方的概念，設計了圓柱形中庭，兩側分別為長方形的圖書館與研究大樓。戴先生、明輝兄、李建築師都是牟宗三先生的學生。因此文哲所的創建，不但成為當代新儒學的重鎮，連物質基礎也是當代新儒家所打下的。余英時先生曾有儒家在當代是游魂之說，大意是儒家失去傳統社會中科舉、家族、政治制度的支撐，成為沒有物質基礎的純思想活動。然而我們卻在文哲所大樓中看到當代新儒學在新環境中物質建設的本事。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是本所的招牌，由於編輯審查嚴謹，來稿多元而質量俱佳，在國內文哲領域是數一數二的學報。其內容除了論文，還有相當篇幅的書評。在外國這是一般學報的通例，但在國內的學報中，學術書評只是偶見。我曾參加過一些學報的編輯委員會，會中每有設立書評專欄的提議，然而訪求適合的書籍與評論人，把關評論水準，都是不容易的任務，而且專欄一旦成立就不可中斷，因此這類提議總是畏難而沒有通過。記得民國八十九年李爽學先生進入本所，又做此提議。戴先生極為支持，認為《集刊》應該克服困難，跟上國際腳步。於是提案通過，並推爽學兄為首任書評主編。於是從民國九十一年起，《集刊》設立書評專欄，據我所知在國內是創舉，且一直維持至今。一本學報中，論文重在提出原創性的見解，書評則是學術成果的介紹與反饋，如果論文的精神是專精，那麼書評的精神是廣博，對於推動學術的健全發展同樣重要。戴先生雖然只是提議，其全力聲援，仍是高瞻遠矚，勇於有為的一例。

戴先生在我第一次代理的期間赴新加坡大學講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黃文斌教授就是那時向戴先生問學的。戴先生乘便考察星馬地區的華人教育，有一定的見解。民國一〇三至一〇六年，我擔任拉曼大學中文系的校外考試委員，任務

是對其期末考試試題加以審查與建議，並在最後一年訪問該系，對其系務、課程等提出建議。有次探望戴老師時聊到馬來西亞經驗，說到拉曼大學中文系的課程結構仿照臺灣臺大、師大等比較傳統的中文系，就是大略兼括了傳統四部中的經、子、集部，加上現代文學。這種結構，在海峽兩岸剛恢復交流時，大陸學者聽到後說：「這是舊中文系。」戴先生聽完我的描述，說他認為馬來西亞不應該走舊中文系的道路，而是應以現代文學為主，並兼重當地的環境。我當時有點驚訝，原先以為文獻、語言等基礎訓練深厚如戴先生，應該會更重視傳統課程。事後想想，戴先生重視的是要用現代的觀點接上傳統。如果沒有考慮當時當地的精神與需要，傳統很難引起學生的興趣，更別說對社會發生影響了。戴先生對教育很有熱忱，有「經典活化」的主張，十年前曾要他的學生申請教育部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輔助教材編纂計畫，組織研究者與高中教師共同參與。但編輯成書後，卻因政局而束之高閣，十分可惜。他又編有《詩經分類選注》，前年還出版《周易經傳疏解》，皆是引領青年學子進入經典堂奧的力作。引領者要對現代精神與需要充分的意識，才能成功，這是戴先生對我們的啟示。

戴先生接主任時已六十歲，原是可以安心做自己研究的年齡，卻臨危受命，一肩挑起建築重任。曾聽他說：「照規矩做就行了，沒甚麼好怕的。」他個性剛直，不怕事，果於有為。需要爭取權益或反駁謬論時，必然侃侃而言，私下曾說：「我可以任勞，不可以任怨。」八十六年六月，在戴先生卸任的交接典禮上，我引用陳亮稱贊朱子的話，說他「負陳群、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他有一種元老重臣的剛直架勢，內外欽服，故能夠帶領文哲所在中研院、學術界出一頭地。在崩離析的當代文化中，能夠立德、立功、立言兼具的，戴先生是難得的一位。

三不朽中，立德各憑良知，立言有待知音，立功則可以具體衡量，而且是讀書人最缺少的一項能力。戴先生留下的功業是以文哲所大樓為首的有形建設，與不分門戶唯問品質的學術標準，所裏同仁都感念在心，而我常覺得自己是最大的受惠者。我雖然研究宋明理學，其實個性近於老莊，懶散不問世事，居然糊里糊塗做了十一年的太平官，無為而治，於己於人，大概都沒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基本上所內人事和諧，各人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奮勉向上。必須說這是在戴先生奠定的基礎上向前運行的結果，於此益發感到戴先生的可貴。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高風亮節——懷念戴璉璋先生

林玫儀*

初識戴先生，是在一九八四年。當時我和沛榮參與三民書局《大辭典》的編纂工作，編輯委員大多是北部各大學中文系的教授，戴先生是其中之一。但由於編纂工作是分別進行，我跟他不熟，請益的機會不多。

對戴先生有進一步認識，是我到文哲所任職之後，當時文哲所尚在籌備階段。我一九九一年八月到職，次年籌備處主任吳宏一先生辭職，由戴先生接任。其後成立圖書館、興建研究大樓等建設都在他任內完成。相識三十餘年，戴先生認真負責、公正廉明的處事風範，令我敬佩萬分。

圖書館是做研究的重要憑藉。文哲所開始籌設，即由研究人員和行政人員組成委員會，負責購書。戴先生一九九二年八月到任後，即積極籌設圖書館，四處尋覓適合的館長人選，於十二月底延聘經驗豐富的劉春銀女士負責設館事宜。劉主任一方面擬訂發展方向，一方面帶領林耀椿、林敏等同仁，將已購入的五萬多冊圖書進行編目，並建置各種專業系統，三個月後，圖書館正式成立。從此館務蒸蒸日上，不但是我們研究工作的後盾，更成為當今文史學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圖書館。劉主任說，她是被戴先生的誠意所感動，才願意從中央圖書館（後改稱國家圖書館）借調到文哲所承擔如此重任，薪資變少、工作變多、離家較遠皆不計較，可見戴先生是如何受人敬重！

再說興建研究大樓，這是何等重大的工程！但是戴先生顧念大家研究工作負擔沉重，只要求我們有空時到工地走一走，幫忙巡視一下，表示對於所務的關心及參與；在落成以後，請幾位女同事協助規劃部分空間的布置工作；其他重擔，都是由他帶著榮智明、林耀椿等行政同仁共同挑起。及至文哲所大樓落成，工程被評為零

* 林玫儀，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缺點！當時負責工程的營造廠老闆對我們說，他承包過很多公家工程，從來沒有遇到這麼廉正的負責人，讓他非常感動，所以他要盡心盡力把工程做好。

大樓落成後，營造廠的老闆想邀戴先生餐聚，戴先生推辭，反而在本處同仁聚餐時，邀請老闆參加。老闆帶了一份禮物來，是一對精美的茶杯，戴先生指示將此禮物加入我們的抽獎獎品中，竟被我幸運地抽到了。這漂亮的杯子我用了許多年。

戴先生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屆滿六十五歲時，請辭主任一職，前後擔任我們的主管五年。他很有親和力，任何時候，我有事情跟他商量，走進他的辦公室，他總是笑臉相迎，立即放下手邊的工作，仔細聆聽，深入討論。和他談話，我從來沒有感受到壓力，這是來自對他的能力和擔當的信任。因為我知道，我的想法若是可行，他就會幫忙促成，若是不可行，他也會提出建議。在這樣的主管下面工作是很大的福氣，也因此全所上下一團和氣，感覺在本所工作真的很愉快。文哲所籌備處當時雖然人數不多，由於上下和諧、同心協力，研究的成績卻令人刮目相看，不幾年就在學術界擦亮了招牌。戴先生為我們營造良好的研究環境，功不可沒。

以下再說兩件我個人所經歷、印象深刻的事。

一九九三年籌備處舉辦了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那是臺灣四十年來第一次國際詞學會議，參加學者來自中國大陸、美國、加拿大、日本、香港、新加坡及本地，共發表二十三篇論文，可謂盛況空前。會議期間我與饒宗頤、吳熊和、嚴迪昌三位教授討論，都認為清代詞學是詞學研究中極其重要的一環。三百年間詞派迭起，詞作數量更是遠軼前代，但研究卻未能開展，主要是因基本資料未能蒐輯之故，所以建議我先訪查存世清詞別集及度藏地，若有可能，更應輯印文本，以奠定清詞研究的基礎。我後來就向中研院申請「詞學主題計畫」，參與學者共有七位，除了上文提到的本處諮詢委員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饒宗頤、杭州大學教授吳熊和、蘇州大學教授嚴迪昌外，還包括加拿大皇家學院院士葉嘉瑩，本處諮詢委員臺灣大學教授張以仁、助研究員劉少雄，以及本人。

「詞學主題計畫」進行期間，為了集思廣益，又籌組一個清詞研討會，在上海召開。箇中原委，是因為臺灣研究詞學的專家較少，而大陸有很多重要研究者，在臺舉辦會議，能夠參加的大陸學者畢竟有限。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雖然成功，但在經費上，單是學者機票的負擔就甚為沉重。況且當時申請大陸學者來臺開會，兩邊的手續都極為繁瑣，等到我方核發入臺證，學者方可持此去辦出境手續，雙方都十分麻煩。因此我和當時華東師大中文系的高建中主任商量，倘若會議在大陸召

開，經費由我方負擔，他們是否願意承擔會務？這樣可以省去許多費用，更可避免大陸學者出入境的繁瑣手續。但是以當時的環境來說，中央研究院與華東師範大學合作開會，勢必引人矚目，甚至會遭人誤解。我把此事可能涉及的各種問題向戴先生報告，戴先生分析其中利弊得失後，願意全力支持。因此，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至十八日，我們在華東師大的清詞會議順利舉行。戴先生親自領隊，帶著「詞學主題計畫」在臺的三位成員及研究清詞的前主任吳宏一和行政人員林耀椿一起出發，饒宗頤及葉嘉瑩兩位教授則分別由香港及加拿大前往。感謝華東師大文學院院長齊森華及中文系主任高建中傾力相助，三天的會議中，共宣讀二十八篇論文，學者彼此切磋討論，獲益良多。華東師大非但會務辦得周全圓滿，會後又安排至松江陳子龍墓參訪，賓主盡歡，至今詞學界仍津津樂道，而經費只需要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的十分之一。這是第一次兩岸重要學術機構的合作，是文史學界的創舉，若非戴先生勇於承擔，以當時的環境來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再者，「詞學主題計畫」中一項重點工作就是清詞別集書目之訪查及編纂。主要是訪查海內外各大圖書館度藏清詞別集之實際情況，由吳、嚴二位教授共同負責大陸部分，我則負責港、臺、美、加部分。經實地訪查取得書目後，再比對版本、彙總、汰重，編成《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由籌備處出版。根據成規，由本處出版的書，若是與處外人員合作的，作者名稱都得由本處人員領銜。我向戴先生說明吳、嚴二位教授是我的前輩，雖然我付出的心血較多，但他們所提供之大陸各地館藏目錄乃是本書的重要骨幹，且若非二位共同參與，我也不敢貿然進行此一艱鉅工作，故應將二位列名在前，戴先生當即接受我的建議。舉此二例，可見戴先生的器識與擔當。

戴先生退休後搬去名門社區，幽靜的小區，雅致的小樓，好幾次到他家裏探望，都覺得在紛擾的市區中能有這樣寧靜的居所可以養老，真的很幸福。沒想到後來因為上下樓梯不便，以致戴先生及師母不得不搬去養老院。養老院環境優美，各方面照護都很周到，我正在慶幸兩位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沒想到竟聽說戴先生跌倒受傷。後來才知道他跟師母在臺安醫院門口等著過馬路時，突然被一個快跑衝過馬路的中學生的背包甩到。這種突然而至的無情力猝不及防，身體無法及時反應，硬生生倒下時傷了脊椎，以致戴先生吃了很多苦頭，復健很久仍然無法完全康復，從此元氣大傷。我們想去探望，戴先生坦誠地說，不想讓人家看到他狼狽的樣子，而且每天要安排復健，時間也不好配合，我只能偶爾致電請安，並為他禱告。後來

欣聞他情況已有改善，沒想到突然接到曉真的簡訊，說戴先生遽歸道山，頓時震驚傷痛，幾乎無法接受。

事後聽月惠轉述戴先生離開前的情況，說當天師母跟月惠離開醫院時，戴先生的精神很好，高興地跟師母約好明天再見，誰知半夜病情突然急轉直下，戴先生打電話告訴師母說「好累好累」，不久就離開了。此事讓我們十分悲痛，但想到在最後一段路程，他沒有受更多苦，也稍覺安慰。戴先生一生勤奮，最後還努力完成《周易經傳疏解》一書，我想到《聖經》中保羅所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摩太後書》4章7-8節），這正是戴先生一生的寫照。戴先生雖然離開了，他的典範長留人間！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戴璉璋先生的學思印象

李豐楙*

記得初到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報到，緣於職務之便，最先認識的就是戴璉璋先生，當時戴先生也剛接文哲所籌備處主任。兩人都是從大學轉到研究單位，必先適應一個純以研究為主的環境，這種調整需要花一段時間。調適期一過就悠游其中，在新單位展開學術之旅，如是感覺只有四個字：如魚得水。但相較之下，戴先生比較辛苦，亟需一肩扛起正創所中的諸般雜事，他常說：「雜務、煩事讓給我們，你們就好好做研究。」這就是戴先生這一輩的擔當。當時的雜事就是覓地蓋研究大樓，文哲同仁方能安於所居，不再寄寓於暫時撥用的房子。記得報到當天特別趕早，由於早就聽聞找地的問題；於是就試著按照修行方法：放空徐行，在清爽的院區游蕩，結果走到一片竹林後，腳步就停住，心想：「消息來了！」眼前是竹林，後面土地廟一角，山頭則是鬱鬱蒼蒼，當下頓覺：「這就是人文紮根之地。」等見到戴先生後，談起覓地之事，就提及有此一寶地；他回應：好的早已被圈定了，但還可找到適合的。被圈定的指當時圍籬，正要蓋地球科學研究所的那一塊。而第二首選正好是這一塊：流水曲澗，沃土待整；既離其他建築有些距離，開發之後確實是好地方。這一塊連同後來蓋的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大樓，當時猶是荒煙蔓草，斯地卻合適文哲所的人文品味。

成為文哲所籌備處一員後，蒙戴先生的托付，就和總務榮智明一起展開營造瑣事：從招標、動土到落成、驗收，其間一切都順利。難免也會有小波折，如：有一廠商未能得標，竟然一狀告到立法院，佯稱工程「綁標」。上面公文一到，戴先生無奈表示：「這就是所謂煩雜之事！」所幸朱高正立委剛好到文哲所聽北大朱伯崑教授講《易》，就請他代為疏通。朱立委一口答應，也順利「擺平」。從這些瑣事

* 李豐楙，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可見戴先生的個性，看似嚴謹，卻處之泰然。承包商南北營造第一次接獲名家李祖原的設計，既想表現，自然就全力以赴。營建過程亦得三合／和：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多雨的南港，當年卻是少雨多晴，致使工期並無延誤；而地處空曠，監工說：「涼爽宜人，工作效率特佳。」至於年終廠商例有尾牙，戴先生即告以職務不便出席，就委由智明和我參加以聯絡感情，甚至自強活動也邀監工參加，故得人和。在完成過程中還有些小事值得一敘：其一絕不拿回扣，李建築師派來的監工深表感佩。其二行禮如儀，按照營造規矩，大日必須遵從古例：凡上樑、落成等，例須祭拜。請示戴先生時一概同意：按照古例，工人安心為要。所以工程異常順利、進度超前。其三營建署驗收，營建署人員來後，戴先生禮貌接待，而後說自己不便，即要我陪同。當時電梯尚未啓用，大半天就爬上爬下，而一切順利。最後他們只得出一個意見：如是經費蓋出如是大樓，的確不容易！中午請他們在院內便餐，戴先生同樣不參加用餐。這就是當時對戴先生的印象：該承擔就承擔，該避嫌就避嫌，雖餐宴小事，亦嚴守不逾。

戴先生的學術有成，知者多矣，然亦有一些日常小事可敘。時值我擔任國科會中文學門召集人期間，剛好也是戴先生榮獲傑出研究獎之際。召集委員就是劉述先先生，他說：「如是獲獎純憑本事。」在中國哲學這一行，他系出牟宗三先生，此乃公開的事。文哲所每月均有輪值演講，兩個小時完整報告研究心得，論文例先發出，同仁都先細讀而後與會，的確是見真章之事。我非哲學專業出身，但每次戴先生的報告，聽完總有所感，就是兼具文本細讀與文法分析，工夫既深，則精意盡出。我和戴先生雖同樣出身師大，惟入學較晚，當時戴先生早已學成而未在校，然師輩幸同。印象最深的就是許世瑛先生，大學本科最重的專業訓練，即循序漸進的「小學」之教：從文法、修辭、文字、聲韻，以至訓詁、版本等，教學的目標就是成為人師。雖偶有批評師大學風者，若有機會親炙，即可知基礎訓練的重要。當時任教的都是一時明／名師，許先生擔綱的就是文法與聲韻，雖說嚴厲，卻受用無窮。猶記在學期間，宿舍流行一句話：「聲韻學過，就畢業了！」所用教科書為董同龢先生的本子，不過增加了許多作業，諸如圈點《等韻》、《中原音韻》等。而每學期末聲韻學將畢，許先生就會示範一次：如何從文法、聲韻解釋文學文本，從詩賦到散文莫不涉及。而我所親聆者，則是王粲的〈登樓賦〉，講得如此精彩絕倫，以致大家不覺熱烈鼓掌。而我和戴先生所受學亦略有不同，主要在文字學與古文字學。由於魯實先先生進師大稍遲，我輩方有幸受教，但同樣要圈點《說文解

字》，俱見清儒遺風；魯先生另還有一絕，就是在夜間部講《史記》，絕對老少咸宜，而坐無虛席。回溯這段往事，就是要理解戴先生當時入門的治學環境，方能透徹其為學之道。

清代的樸學餘韻既盪漾於師大校園，戴先生一代還有一幸，就是親炙於牟先生。既有樸學根柢，又有義理精深，造就一批批臺灣的中學老師，也關繫一代代的人文素養，由此理解師範教育的精神，亦可體會戴先生的治學風格。記得有一次輪到戴先生依例宣讀，乃以魏晉玄學為題，其剖析入微，而玄理意蘊自然而出。聽畢，不覺趨前說：「戴先生！真是合許、牟二師工夫於一。」當時他只會心一笑。文哲所新創的既定取向，其一正是「中國哲學」，也開出「比較哲學」容納俊彥。哲學界均知鑽研中國哲學，不脫歐陸哲學的訓練，哲學詮釋亦為當代顯學。但治中國哲學的基本功，仍然不脫文本解讀的工夫。戴先生謙稱自己沒有機會受到西哲的完整訓練，卻仍善用所長，而合樸學與哲學於一，即其論文之精彩處。在印象中他以治《易》有名，但例行宣讀反而多魏晉玄學。每次先細讀而後聆聽，其條理分明而講解精彩，這種文本解讀而意蘊盡出，全賴樸學與哲學合一的工夫。戴先生正是其中代表之一，世代相傳，可謂善傳者。

中研院乃是宜於治學的學術園地，當年得到王夢鷗先生的明師指點，選擇了道教這樣冷僻的學術方向，卻有幸進入文哲所。某次向戴先生請益的難得機會下，觸及治道教之學的學術處境，他當下即說：「為學之道，顯與不顯端賴有心人，能達即顯。」當下頗有感悟。道教之學雖則冷門，樂在其中也就自有所得。又想到甫接戴先生訃聞，其中的悼念文，等同一個世代的實錄：「跨越時代的艱困，在戰火中傳承學術薪火。」戴先生世代的許多師長輩早已飄零，如今先生亦逝！不禁反思我輩，儘管戰後的學術資源雖仍艱辛，卻可放心為學，不曾受到戰火干擾。正如戴先生提到薪火傳承，總同樣重複一句話：「繁雜之事我們承擔，新一代好好讀書。」其實先生在學術晚年，在文哲所亦享有優渥的園地，確實在此圓其學術之夢。而退休之後孳孳完成其治《易》之願，斯人斯作非僅一部專著，而是將生命感悟盡萃其中。在此紀念戴先生，既緬懷其人其時，也追憶同一世代的師長，感慨人命有時而盡，而學術慧命方能跨越時空。此一跨越的世代終將寫入歷史，斯人斯學，其價值正在於此。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建立一個能夠獨立而自由做研究的基地」：緬懷戴璉璋先生的志業與貢獻

黃俊傑*

在疫情嚴峻、寒流來襲的淒風苦雨之中，傳來廣受敬重的戴璉璋先生辭世的消息，心頭為之一震。後來得知戴先生以九十高壽安詳離世，未為病苦折磨，亦為莫大福報，使崇敬戴先生、關懷戴先生的友生，在哀痛之中稍感安慰。

戴先生九十高齡的生命之旅中，最重要是在臺灣師範大學任教二十三年春風化雨，與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年的行政領導與研究工作。戴先生較我年長十四歲，我只趕得上親證戴先生在文哲所十年工作所展現的人格與風格，衷心讚嘆。在戴先生仙逝之後，我重讀戴先生的回憶文字，以及三十年前中央研究院審查「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的會議紀錄，緬懷戴先生的志業與貢獻，仰望之餘，為之神馳不已。

就我的觀察與體認而言，戴先生在文哲所十年所堅持一以貫之的志業，就是他在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應邀在臺灣師範大學「在臺漢學家學思歷程」講座，所發表演講中所說的：「為文學、哲學界建立一個能夠獨立而自由做研究的基地。」他認為，「實證主義不是唯一的治學門徑。如果堅持只有實證主義，在文學、哲學的研究上就會受到阻礙」（潘朝陽主編：《漢學研究叢書 03：在臺漢學家學思歷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4年〕，頁311；以下引用此書簡稱《學思歷程》）。

民國八十一年(1992)他到文哲所之後就開始規畫「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經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三日文哲所第七次諮詢委員會議通過後，向院方申請研究經費，在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下午提到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第二次委員會議，

* 黃俊傑，國立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作為第九項專案討論。戴先生回憶這個研究計畫的審查經過說：

當時的副院長主持這個審查工作，他告訴我說你趕快去跟何炳棣教授溝通一下，他要反對，激烈地反對你這個案子通過。我跑去跟他溝通，他說你這個計畫是不是為劉述先一個人設計的，我說這怎麼可能，我們堂堂一個研究所，劉述先只是參與這個計畫。他說：「好，如果你能夠把唐君毅最後的那本書《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翻成英文，讓我接受、看懂、肯定，我就支持你這個計畫。」我問說：「你哪天回美國？」我記得那天是7月1號，他說：「7月4號回去。」我說：「你怎麼要我四天就翻成英文。天地間有這樣的人可以做嗎？七百多頁的哲學巨著，非常專門的東西，我即使翻成英文，你接受不接受，還要由你自由心證，我怎麼做這個工作？你如果願意，我可以安排一個座談會，跟你討論，你可以提出許多疑問，我們來答辯。即使一時不能回應，以後書面回覆，這才是學術討論。」結果他不接受，於是不歡而散。（《學思歷程》，頁312）

在與何先生溝通未果，「不歡而散」之後，戴先生接著就以他個人的去留力爭「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的推動。他接著回憶說：

結果第二天開會，我就跟文哲所諮詢委員召集人丁邦新先生說：「你們院士開會，我會列席，何炳棣會強烈反對。如果這個案子在院內不通過，我第二天就會向院裡辭職。我是從師大借調來文哲所的，回師大還有書可教，我不幹了。為什麼不幹，是學術被打壓的理由。」我又說，我會招待記者，開個會，指出中研院的學術環境比秦始皇的皇朝還要專制，我一定開這個會。我這個話一放，當然丁邦新趕快傳給何炳棣〔按：原書作「楊振寧」，係記錄者誤植，今改正〕，傳給副院長，副院長也緊張。於是在會上討論這個案子時由我先提出報告，李明輝在下面錄音，所有的發言全部錄起來，我要開記者會，我不是鬧著玩的。結果是勉強通過，給我們試行一年，一年如果交出好成績可以繼續，一年如果不行就取消。我們是這樣辛苦，把這個專題計畫在中研院打下基礎，這個計畫後來連續做了9年。（《學思歷程》，頁313）

這項研究計畫的審查經過及所有出席審查委員的發言紀錄，都翔實地刊載於《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第二卷第四期（民國82年10月1日出刊，以下引用簡稱《通訊》）。根據這份會議紀錄，何炳棣院士首先發難，他引用余英時院士〈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的部分文句，指出：「它〔指「當代儒學」〕根本不是個學問，

而是製造出來迷人的一種新的宗教。」(《通訊》，頁 52 左) 又針對劉廣京院士建議，應該請儒學研究的重要學者狄培理 (William T. de Bary, 1919-2017) 參與該研究計畫說：

我認識 de Bary 幾十年，他是跟唐君毅走的，他治學的目的是為了出風頭，他的觀點是不對的。(《通訊》，頁 53 左)

為什麼 de Bary 的觀點不對呢？何先生認為「〔唐君毅〕所謂的『心靈九境』開出來的完全是自欺欺人，絕對不會達到最低哲學思維的要求」(《通訊》，頁 52 右)，又認為：「最不懂的是為什麼找了一個最有問題的人來作為研究的對象？」(《通訊》，頁 52 右)，所以何先生結論說：

今天我們若贊成這個新儒家，那比贊同這一類的研究，良心上還要有虧，因為傳統的哲學家們研究這些，至少不是自欺欺人，但今天新儒家完全是為那個「教」，而不是為自己的良知 (personal integrity and personal honesty)。(《通訊》，頁 53 右)

何先生因為嫌惡唐君毅先生與劉述先先生，而主張「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不是個學問」，不應執行。他發言之後，余英時先生接著說：

我要說的是我不贊成新儒家，新儒家也批評我，但我認為這與本計畫是不相干的。新儒家作為一個文化現象、社會現象，作為一個對時代的反應，本身如果作為一個客觀研究，還是值得做的。我們對於某一研究對象可以完全不歡喜，例如我在文哲所諮詢會中也對這一計畫有所批評，但我沒有反對這個研究。基本原因就如胡適先生所引用伏爾泰的一句話：「我完全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我還要為你爭取說這意見的權利。」這就是我的基本態度，這態度與我贊不贊成新儒家的哲學理論沒有關係。……我不能因為在學術觀點上不贊同新儒家，便禁止別人對新儒家的研究。(《通訊》，頁 53 右-頁 54 左)

余先生強調應將個人對歷史人物的好惡，與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區分開來。他這項論點非常重要，一針見血。

丁邦新院士接著說：

對於這個儒學當代化的研究，即使裡頭有做新儒家的一部分，即使新儒家是不對的，我們也得要研究。毛澤東大概也是不對的，但咱們不能不研究毛澤東的思想。今天由於個人的認知，認為那一地方是對，那一地方是錯，這是屬於個人的看法。也許何先生覺得 de Bary 走的方向是錯的，但也不能因何

先生這句話就把他整個學術研究成績都否定了。(《通訊》，頁 56 左)

丁先生也強調應將個人情緒性的好惡，與學術研究有所區隔。這一次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的審查經過與委員發言內容，是現代學術史的一段重要史料，似乎印證了劉勰(465?-520?)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所說的，做研究不可「任情失正」，必須「析理居正」。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有關「當代新儒家」的中文與外文著作之出版如雨後春筍，早在一九七七年墨子刻(Thomas Metzger)出版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就深受唐君毅對中國文化的觀點之啟發。研究唐君毅哲學的中英文研究論著之出版也此起彼落，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先生與丁邦新先生當年發言之「析理居正」。戴璉璋先生在「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案所堅持的，正是「析理居正」的學術立場，體現了他畢生所追求、所堅持的：「獨立而自由的做研究」的精神。

戴先生將他「獨立而自由的做研究」的精神，落實在文哲所創立以來的審查制度之上。戴先生擔任文哲所籌備處主任時，堅持不論是哪位長官交代下來的申請案，都依照制度送審。他曾回憶那一段時間的工作說：

當時的審查工作是由所長一個人決定的，籌備處主任就是所長，我剛剛講到院長、副院長推薦人，我本來一個人就可以決定審查人的，但是我料定，事後會有很多問題。我就找了在美國的擔任諮詢委員會召集人的杜維明，還邀請王叔岷老先生，輩分夠高的。我們三人組成一個小組，商量合適的審查人。在海內外找出這個申請案專業方面的的確確有很高造詣、大家心服口服的人。我們找了四個做審查，三個極力推薦，一個不推薦，結果就是沒有通過。副院長為此緊張得不得了，我還沒有上班，就坐在我辦公室等，見到我就問怎麼回事？我把原始文件拿出來，我的保險櫃裏頭沒有錢的，錢都在會計室那裏，我的保險櫃專門藏這些重要文件。相關的資料全部搬出來，我說請你看，一清二楚，他沒有話講。副院長晚上會跟申請人見面，我請他告訴申請人這個審查絕對公正。結果那申請人還在外面放話，說我們是新儒家來打擊他。(《學思歷程》，頁 326-327)

以上這一段三十年前的歷史，見證了戴先生擔任文哲所籌備處主任時，為建立公正而客觀的學術審查制度的努力，這是他對文哲所所做的重大貢獻。

除了以上所說的「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的推動，以及審查制度的堅持這兩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建立一個能夠獨立而自由做研究的基地」：緬懷戴璉璋先生的志業與貢獻

項貢獻之外，戴先生在文哲所籌備處時期，筆路藍縷，為文哲所大樓的建設盡心盡力。戴先生在那一段時間為建大樓而心力交瘁之程度，已嚴重影響了他的健康，當年許多同仁都看在眼裏，都心生不忍。

戴先生已經遠行，但是他的志業與他的精神必將長留於天地之間。他所建立的「獨立而自由的」研究基地文哲所，必日新又新，更上層樓。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含璋光化、經師人師：懷念戴老師

翟志成、華 瑋*

昨日破曉時分，志成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和華瑋攜小女君宜，一同到軍功路戴府作客；一樣熟悉的客廳、一樣可口的茶點，以及戴老師和師母一樣親切的笑容，都和昔日相同。閒聊間，師母談到，戴老師為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新撰了一篇論文，想請楊祖漢翻譯成英文……。中譯英為何不找華瑋？志成心中一急，便醒了。起床後，志成和華瑋談起這個離奇的夢，華瑋有二點分析。其一，戴老師仙逝之後，志成的紀念文章至今仍未開筆；其二，年初楊祖漢兄來中大客座，請他夫婦便飯的邀約，因香江疫情尚未兌現。華瑋這種佛洛伊德式的解夢，果能切中肯綮，但志成以為仍有一間而未達。這未達的一間，便是潛意識中對戴老師的虧欠之情。

志成在一九八五年初識戴璉璋先生於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戴先生是牟宗三先生任教臺灣師院時的早期學生，而志成則是徐復觀先生在新亞研究所時的晚年弟子。當代新儒學的共同淵源，使得志成視戴先生為學長，常向他問學請益，每有論文撰成，在投稿前亦先請戴先生指正。而戴先生也毫不客氣，對文稿上的缺失一一指陳，使志成的論文在發表時避免了不少錯誤。古人素有「一字之師」之稱，而戴先生在學問上之惠及志成，又豈止一字而已！憶及熊十力先生曾在一書函責備某學者，謂無論從年紀到學問，其人都不應稱彼為「兄」，志成不禁為自己昔日的非禮無法而痛自懺悔，在稱謂上遂把「璉璋兄」改為戴老師了。

一天，志成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讀書，發現了臺灣師大某教授的「專書」，從正文到注釋到標點符號，大都抄自某大陸學者的著作，便當作笑話告訴了戴老師。戴老師把二書借來對照之後，便去信勸諭某教授。當時臺灣學界對抄襲的容忍度極為寬鬆，中研院近史所某研究員全抄了大陸之書被揭發之後，身為「國家

* 翟志成，香港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華 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

最高學術機構」所給予的處分，也只不過是「禁看匪書半年」而已。戴老師和某教授交情匪淺，但戴老師維護學術倫理的苦心，畢竟壓倒了多年同事之誼。雖說學術乃天下公器，但放眼當日臺灣的中文學界，敢於直道而行，不顧私誼，不怕樹敵，絕不因私而廢公者又能有幾人！這是戴老師的可敬處和不可及處。

一九九〇年秋，志成來到中研院近史所工作，而華瑋則繼續留在美西華盛頓州的大學教書。夫婦分居兩地的寂寞、思念和諸多不便，因君宜在一九九一年底的誕生而變得愈來愈不堪承受。為了給君宜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夫婦長期分居的不正常狀態必須盡快結束。當時在美國高校教授中國歷史的職位，往往一年只有一兩個空缺，志成沒有可能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找到教職，回美團聚便須再回船廠鋸鐵。華瑋倒不難在臺灣高校的外文系找到教職，而事實上中正大學文學院也曾以外文系主任的職位相邀，並連帶在歷史系給志成一個副教授的職位。不過，華瑋的治學和研究興趣，在負笈柏克萊時便早已轉往了中國戲曲，到外文系任教也就等於改行，故心中亦不甘願。正在苦惱之中，志成想起戴老師已離開了臺灣師大，轉任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並憶及戴老師在星洲時，曾對臺灣高校中文系故步自封的習氣，有深刻的反省和批判，遂建議華瑋或可向文哲所一試。

在華瑋正式向文哲所提出申請之後，志成便中斷了與戴老師的一切聯絡，有時在中研院的行人道上遠遠望見，志成也會繞路避開。又過了幾個月，華瑋返回臺北省親，戴老師主動致電告訴華瑋，申請案中所有的外審報告，結果都是「極力推薦」，而在剛剛開完的諮詢委員會議上，申請案亦已獲全票通過。華瑋連忙向戴老師道謝，戴老師正色地說：「申請的成功，完全是憑妳自己的成績所得到的公正結果；我只不過秉公辦事而已，妳不應謝我，更不必謝我。」話雖如此，如果沒有戴老師破除了傳統中文系的門戶之見而廣納不同學科的人才，文哲所又怎能有如今天般的興旺發達氣象？華瑋和志成又怎能同在中研院這一最優良的學術環境中各自追求卓越，無須改行犧牲了其中一人志業？而君宜能在溫馨和樂的家庭中快活和健康地成長，究其實也是拜戴老師的遠見和公心之所賜。每年春節，我們都會攜同君宜到軍功路戴府向老師和師母拜年。多年後華瑋和志成先後轉到香港教書，每年返臺過春節亦復如是；但此時老師和師母已遷入陽明山深處的至善安養中心了。老師和師母多次把登門拜年改為聚餐，地點就訂在離我們下榻之處只有數步之遙的悅上海餐廳，寧願自己僱車前來，一輩子就是這樣只會替別人著想。

戴老師不諳英文，文哲所的往來英文文件書函，多靠師母操辦。華瑋到文哲

所上班之後，志成曾向戴老師提及，日常的英文案牘似可找華瑋分勞。戴老師但漫應之，卻從未找過華瑋一次。二〇一九年的春節期間，志成和華瑋最後一次與老師及師母在悅上海聚餐，得知老師半年前在大街上被撞傷脊椎之後，變得有些不良於行，便力邀老師到香港治病。蓋香港有一董姓老中醫，曾用金針治好了志成半廢的左手、華瑋無力的右膝，以及多位大學同行的疑難雜症，其針灸功夫之高明，已有許多實例為證。華瑋還說，老師在香港治病時可住在我們家中，再由志成陪同到診所請董大夫施針，不僅居住、醫療都十分方便，而我們一家也有幸多了親近老師的機會。戴老師聽到董大夫的神技，似乎有些心動，但後來便辭謝了。他說須等到在美國的長女祖寧請到長假，陪他一起赴港，才會找董大夫看病……。由臺回港之後，華瑋便把戴老師的病情向董大夫請教。董大夫說，戴老師脊椎的負傷既超過半年，已錯失了施針的黃金時期，來港治癒的機率應遠低於百分之五十。因董大夫並沒有十分把握，我們遂不敢再強邀老師來港。

由於疫情阻隔，我們已逾兩年未曾返臺，春節期間也只能改用電話，遙向戴老師和師母拜年。但今年還未到春節，便從胡曉真教授的來電中，得知戴老師已於一月八日仙逝。戴老師對我們一家的恩德，真正是如山之重，而我們卻從未能有涓埃點滴的回報，就連回臺北送戴老師最後一程，也因疫情而無法成行。華瑋本擬拜託楊貞德教授代購一花牌，在戴老師大殯之日送到靈堂，以寄託我們全家的敬意和哀思，但也因主事者的「敬辭花籃」而無法如願。

「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自古已然，於今尤烈；究其主因，端在證道者的欠缺。戴老師畢生踐履儒家的中道，「含璋光化、經師人師」這八個字，正是他生命和精神的表徵。他的辭世，使得當代新儒學在蔡仁厚先生二年前化去之後，又少了一個重要的證道者。「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死亡對於一個儒家的證道者，不過是勞作後的安息。戴老師的學術、功業、道德和精神生命，永遠充塞在天壤之間，而他的懿行嘉言和音容笑貌，則長存在親戚師友和我們這些學生的夢寐和憶念之中。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戴璉璋老師從遊記

梁承武*

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也是我最敬愛的老師，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暨研究員戴璉璋先生，二〇二二年一月五日因肺炎緊急住院，一月八日因肺炎併發心肺衰竭而辭世。二月八日十時，在臺北第二殯儀館至真二廳舉行了追思告別儀式。因新冠疫情，我無法赴臺灣參加公祭。家屬不收奠儀、花籃，我還是委託黃瑩暖教授代為呈上奠儀以表哀思，但家屬堅持不收，只能進獻了一篇悼詞和一幅輓聯，敬表哀悼之意。另外，我還蒐集整理了十篇戴老師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目錄，轉交給林月惠教授。林教授告知，告別儀式以視訊連結方式同步舉行，所以我就通過 ZOOM 參加了告別儀式。在儀式的最後，專門安排了黃瑩暖教授代讀弟子呈獻的悼詞與輓聯，以遠程寄託無法到場弟子的哀思。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戴師母的安排！

在潘朝陽編輯的《在臺漢學家學思歷程》中，戴老師談到他在臺灣的主要教學與學術歷程，展現了戴老師的為人、為學及工作原則等方面。本來他並不很願意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但牟宗三老師說，這項工作固然不易，但如果戴老師不去，中國哲學便無處紮根。在牟老師的鼓勵之下，戴老師接任了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籌備處主任，並在那裏工作了十年之後光榮退休。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我在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唸碩士班。畢業當時，臺大哲研所還沒有博士班，要唸哲研所博士班，就只能選擇輔仁大學或文化大學。但兩校都是私立大學，學費較貴，而且宿舍、校區與臺北市區的距離等條件也不很理想。當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有義理組，也具備讀書和研究的條件。我認真準備了研究計畫之後，直接去拜訪師大國文研究所所長，當面提出申請。所長看完

* 梁承武，韓國中央大學榮休教授。

我的入學申請書和研究計畫之後，說：「歡迎你來讀書。」就這樣，我進入了臺灣師大國研所博士班，開展了一段新的求學歷程。

入讀臺灣師大以後，第一年我們先要學習研究所指定的中國哲學史、文字學、文獻學、版本學等。第二年開始，就有選擇指導教授的問題，學生要自己找指導教授。我向研究所所長提出，牟宗三老師已經來臺講學有年，能否請他擔任指導教授，他說有點困難。當時我也知曉，過去牟老師在師大教書的時候，與系內同仁相處並不和諧。這點我能理解，所以就沒有強求請牟老師指導。之後，我就拜訪了戴老師，請求指導，戴老師並沒有立即答應。我又拜訪了研究所所長，請求由戴老師指導，而所長則推薦了另外兩位教授，但我執意要請戴老師指導，最終獲得了戴老師的同意。戴老師建議我撰寫陽明學方面的博士論文，但我作為韓國學生，對朱子學理解起來比較容易，要研究陽明學，就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戴老師就同意我撰寫朱子學方面的博士論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臺灣師範大學與退溪學研究院聯合主辦了「第四屆退溪學國際學術會議」。在會議上，戴老師發表了〈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一文，當時我以研究生的身分在司儀組參與會務與翻譯工作。大會圓滿結束後，退溪學研究院李東俊理事長向首爾大學教授打聽，這次發表的論文中哪篇比較有內容和特色。首爾大學教授推薦了戴老師這篇，李理事長就要我安排與戴老師見面。

一九八〇年上半年，李東俊理事長在臺北邀請戴老師共進午餐。兩位會晤時，我陪同翻譯。兩位談了很多有關儒家思想與退溪學研究發展的問題。戴老師提議退溪學研究院邀請當代世界著名哲學家、儒學家赴韓講學，尤其本身是山東人的牟宗三老師。李理事長旋即決定親自去拜訪牟老師。之後，我就陪著戴老師引薦李理事長前去拜訪牟老師。李理事長當面提出邀請牟老師訪韓。牟老師以高齡之故，本不願答應。但李理事長不肯放棄，繼續懇請說：「儒學起源於中國山東，孔子是山東人，牟先生也是山東人，我們弘揚儒學思想，牟先生一定要出手相助。」最後，牟老師答應了，決定當年七月下旬訪韓。到了七月中旬，我遵照牟老師的吩咐而事先返韓，到退溪學研究院探問準備牟老師訪韓的日程安排。一切妥當後，我返回臺北，向牟老師和戴老師匯報。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和時任臺大哲研所助教的鄭錦倫兄，陪同牟老師和戴老師，在臺北松山機場搭乘大韓航空班機，飛往首爾金浦機場。退溪學研究院代表在機場迎接，並安排入住首爾樂天酒店。當日下午，一行人訪問了退溪學研

究院，又赴距離不遠的成均館訪問，參拜文廟，並與朴成洙館長商談儒學發展交流事宜。他們還請牟老師留下題字作為紀念。七月二十四日一早，一行人前往安東陶溪，參觀陶山書院，對退溪李滉先生遺像行禮，然後就去了慶州。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參觀了新羅千年古都慶州的佛國寺、雁鴨池及博物館等地。回程途經大邱時，由啟明大學申一熙校長接待中餐，校方也請牟老師留下訪問紀念題字。下午返回首爾樂天酒店。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一行人訪問了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院長李崇寧先生，並參觀了研究院。他們共進中餐後交談。晚上，韓國哲學會的中國哲學分會和韓國哲學分會兩會代表，邀請牟老師參加歡迎晚餐和座談會。牟老師在演講中提出東方哲學研究的方向與課題，並一一答覆韓國學者提出的問題，交流活動十分圓滿。七月二十七日，牟老師與戴老師結束了五天四夜的訪韓行程，搭乘大韓航空班機返回臺北。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間，戴老師前往首爾、香港、東京、中國大陸、德國、美國等地，參加退溪學或儒學思想國際學術會議十餘次。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首爾退溪學研究院召開「第五次退溪學國際學術會議：朱子學與韓國儒學」，戴老師宣讀了論文〈當然之理與實然之理〉；一九八三年十月，美國哈佛大學召開「第六次退溪學國際學術會議：退溪學與新儒學」，戴老師宣讀了論文〈居敬與窮理——退溪工夫論的省察〉；一九八四年九月，德國漢堡大學召開了「第七次退溪學國際學術會議：東洋哲學中的退溪學與新儒學的影響」，戴老師宣讀了論文〈理氣關係與道德實踐——退溪實踐論的省察〉；一九八五年八月，日本李退溪研究會和筑波大學召開「第八次退溪學國際學術會議：退溪學之歷史的位置」，戴老師宣讀論文〈李退溪《自省錄》之研究〉。

一九八一年元月中旬，我本打算利用放假的機會返韓，但因當時我在大直國防語言中心韓文班以兼任副教授的身分教韓語，並且在信義路國際電信局為接線生教授韓語。教授語言實習難免多說話，以致喉嚨嘶啞，患了感冒，一時無法返國。在這段期間，在韓國中央大學任教的朋友來電說，中央大學成立了中文系，應該會招聘教授，所以我又匆匆忙忙地準備回國。返國之後，在中央大學朋友的安排下，我與校方有關負責人見面。二月中旬，我返回臺北，開始收拾行李。緊接著，還要跟臺灣大學、臺灣師大、國防語言中心、國際電信局、駐臺灣韓國大使館等處申請有關證件，並請戴老師親筆撰寫推薦書。然後，我拜訪了臺灣師大和臺灣大學的老師。在我求學期間，他們對我學業、做人、生活等方面都有細心周到的照顧。這

份恩情，我沒齒難忘。此時，雖然我的論文尚未完成，但仍要回到韓國，開始教學生涯。在返國教書期間，我每年都利用寒暑假，到臺灣拜訪戴老師和其他老師，以請教學問，並蒐集論文資料、買些新書，還跟研究所的朋友交換一些信息。通常是兩、三個星期就返回韓國，準備下學期的教學。

一九八三年八月中旬，我結婚成家。當時，我在中央大學外國語學院擔任教學部長，因校務繁忙，一直忙到一九八三年十月底才能擺脫校務工作，前往臺北。新娘子陪我到臺北開始新婚生活，其實是全力以赴，撰寫博士論文。在戴老師的指導下，我的論文題目訂為〈朱子哲學思想之發展及其成就〉，要分析整理當代新儒學的理論體系，來詮釋朱子學。我完成每章的稿子後，就呈請戴老師過目。戴老師看得很仔細，對我指點啟迪頗多。他還特別強調說別咬文嚼字，要盡可能以白話文來撰寫。一九八四年六月下旬，我終於完成並提交了博士論文。於七月初，我通過了口試答辯。七月中旬，將最終修改好的博士論文提交，取得了文學博士學位，也結束了近十年的臺灣留學生活。我內心特別感謝牟老師與戴老師的指導和栽培。

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新加坡國立大學邀請戴老師擔任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在研究所，戴老師除了幫助編訂國家倫理教科書之外，還撰寫了《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1988年在新加坡出版，1989年在臺灣出版）。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至十六日趁著奧運會召開之機，在首爾召開了規模空前的「第十屆退溪學國際學術會議」。戴老師因當時在新加坡專心研究著述，無法前來與會，也是不小的遺憾。

一九八九年十月，中國人民大學和國際退溪學會於北京友誼賓館共同主辦「第十一屆退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戴老師偕同師母一同來出席會議。退溪學大會結束後，戴老師接著參加了中國孔子基金會在北主主辦的「紀念孔子誕辰 2545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我陪同戴老師和師母一道與會。會後，又陪同二位及其他海外學者一同前往山東曲阜，參加接著舉行的「紀念孔子誕辰 2545 週年祭孔大典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參觀了孔廟、孔府、孔林，還登上了泰山。戴老師和師母結束了曲阜之行後，和戴老師的叔父在上海會合，返回闊別四十年之久的溫州麗水老家。二位祭拜了父母的墳墓，探訪了以前的故居，還拜見了舅父、姑母等親屬，恍如隔世。

一九九三年十月九日至十三日，藉著在韓國大田主辦世界博覽會的機會，韓國儒教學會與忠南大學共同主辦「儒學思想國際學術會議」。戴老師以〈儒學與現代教育〉為題做了主題演講，指出儒家中和思想是現代德育、美育的重要資源，若能

善加開發，有效利用，必會加強對中和之道的體認，而且大有助於因應時代課題。在第一天晚宴上，宣布發起了「國際儒學聯合會」，這是由中國大陸、韓國、臺灣、日本、美國、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八個國家及地區共同發起的，戴老師在場見證了此一歷史時刻。會議結束後，我帶著太太和兩位子女，拜見戴老師與師母。兩位非常高興，撫摸著孩兒，給了他們倆見面禮。戴老師在一九九四年至二〇一四年的二十年間，由臺灣孔孟學會推薦，擔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一屆至第四屆副會長，在儒學思想的研究發展及交流傳播方面，做出了莫大的貢獻。

一九九七年六月，在新加坡擔任國際儒聯第二至三屆理事長的唐裕先生支持下，新加坡國立大學漢學研究中心舉辦了「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儒聯第二屆儒學思想國際學術會議），有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的二一六位學者參加，共發表了六十九篇論文。在會上，戴老師發表了主題演講〈自我覺醒與生命的安頓——回、儒人文思想的初探〉，我也宣讀了論文〈當代儒學與宗教——以韓國儒學與宗教為中心〉。第一天晚上是以新加坡社會弘揚儒家思想為主題的各國代表座談會，戴老師也與會，並提出了新加坡儒家思想的普及方向。二〇〇一年十月，新加坡儒學會舉辦了「儒學與新世紀的人類社會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儒聯第三屆儒學思想國際學術會議），有十個國家及地區的一二〇名學者參加，共發表三十八篇論文。戴老師發表了〈儒家的人文關懷〉的主題演講，首先提出了仁與智、利與義的互動，以及同與和的調適，來凸顯儒家人文關懷的基本準則，接著闡述以科技發展與仁智互動、經濟發展與義利會通、文明衝突與和同調適來呈現現時代的文化問題之儒學關懷。我也宣讀了論文〈儒家的踐履之道〉，提出仁教的義理內涵與仁教的踐履方向。能在這兩次於新加坡大學主辦的大會上拜見戴老師，我特別高興，戴老師也親切地問候我的家人，並垂詢我的研究工作情況。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戴老師七十華誕，受業門生決定出版呈獻《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哲誕論文集》，我為此撰寫了一篇論文〈栗谷與牛溪的四端七情論辯之研究〉。戴老師親自於圓山大飯店邀請諸位門弟子，表示謝意。當時我因在校擔任事務處長，不好離開崗位，錯失了與戴門師兄弟團聚的機會，如今想來追悔莫及。

二〇〇七年一月，我和太太、女兒一起訪問臺灣。我們先去拜訪了戴老師和師母。當時兩位已經離開金門街故居，搬到文山區軍功路獨棟住宅。那裏是遠離市中心靠山幽靜之處，十分適宜兩位安居。兩位盛情接待了我們，特別是看到小女兒，

十分親切。那天晚上，戴老師邀請我們一家和楊祖漢教授夫妻聚餐，暢談過往、展望未來，我們再次切身感受到了戴老師溫和體貼的風度。

二〇一〇年四月，臺灣師大國文系已榮退的汪中老教授逝世，我以韓國師大校友會長的身分前往臺北，參加追悼告別儀式。到臺北的第一天晚上，我與楊祖漢教授一同去拜候戴老師及師母，兩位都過得很平和安樂。當時戴老師提及過一陣子要到養老院安度晚年。我本想仔細探問，看能否有所幫忙，但那次是趁著弔唁汪老師逝世的機會來訪，時間有限，故不能多陪老師，做進一步的請益。汪老師出殯後，第二天我就趕回首爾。

此後，我一直沒有機會再赴臺灣拜見戴老師。本來計畫在去年他老人家九十華誕前專程前往臺北探望他，但因新冠疫情來襲而終未成行，留下了莫大的遺憾。每每想起從遊戴老師的點點滴滴，不免感慨萬千。吾等為人弟子者，唯有繼承發揚戴老師的學術思想和做人風範，才能無愧師門，也是對老師最好的告慰！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敬悼戴璉璋老師

楊祖漢*

在戴老師逝世前，我很慶幸在去年的十二月十日，能與老師、師母在天母共進午餐。黃瑩暖教授夫婦也一起與會。還好瑩暖夫婦先到至善安養中心接兩位老人家，不然那次的餐聚可能會使戴老師的體力不勝負荷了。我們夫婦到餐廳時，剛好戴老師、師母也正下車。當時老師的步履已經相當緩慢。兩位老人家最近兩年在至善安養中心安居，由於疫情，不開放外客探訪。戴老師好像也樂得專心寫書，雖然也常有電話與電郵聯絡，但不能見面請安，內心當然是不滿足的。這次因為老師、師母知道我要去香港任教一學期，主動約我們吃午飯，才有這次難得的見面。在餐聚時，我們談起老師的近著《周易經傳疏解》。他說沒有人對他的書作出評論。我說書寫得非常好，大家不敢隨便提意見。我隨後提到書中綜論所說《周易》經傳的作者，運用有限的符號、結構，表達了人生無限的可能處境及其回應之道，而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易》卦的卦象符號可以靈活運用，交互迴環輾轉引申。我認為這個說法非常好。戴老師說，這就是他的心得！書中對此意頗有發明。談到這個地方，我覺得戴老師又表現出往日講學時的神采。我也為戴老師的心思還是非常清明，而感到高興。當然當天不敢太讓老師費神，沒有再多談，餐後就請瑩暖夫婦送二位回住處。如果早知道他不到一個月就遽歸道山，當天一定把握機會多多請益。老師這本最後的著作，對於《周易》義理有非常通透清楚而又深入淺出的講解，對於經傳文句，也疏釋得清楚明白，義理與訓詁兩方面都達到非常高的學術水準；字句間所表現出之純粹平正的氣象，更是同類的著作所不能及的。在餐聚後第二天，戴老師打電話給我，說如有可能，他這本著作最好能出大陸版，讓此書在中國大陸能發生作用。這個事情我拜託了高柏園教授，希望能達成老師的心願。

* 楊祖漢，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榮譽教授。

今年元月八日早晨，瑩暖教授傳來老師逝世的消息，語帶哽咽表達了對老師的不捨。我就說，我們已經很幸運，能夠在老師最後的日子，陪他吃飯談學問，他也交代了對他最後著作的期望。師生是道義之交，道義的精神是超越生死的，不必難過。在老師喪禮期間，我不能到臺北的靈堂致哀及安慰師母，甚感遺憾。又知道岑溢成兄本來要到二殯，見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也就是戴老師最後一面，但前一天晚上摔倒成傷住院，不能前往，這更增加了我的遺憾與難過。

我在臺灣師大念國文系的四年，得到戴老師與溢成兄非常多的啟發與照顧。溢成雖然有妻有子，但在現今的疫情下，只能像一個孤獨老人般生活在臺灣，與他的長年痼疾艱苦奮鬥，雖然得到往日的學生們的無私照料，但內心一定十分寂寞蒼涼。我在民國六十年到臺灣師大讀書，溢成兄當僑生服務隊員，在樂群堂接新生的車。他看到我行李中有熊十力先生的《原儒》，就問我：「這書你看得懂嗎？」語氣有點輕視。我當然不肯示弱，說：「怎麼不懂？快看完了。」溢成好像很高興看到對義理之學有興趣的學弟，此後常到我住的宿舍房間聊天，往往一談就好幾個小時。如果感到打攪了房間內的其他同學，我們就站在走廊聊天，其實在走廊也往往聲調高亢，旁若無人。當時候廖鍾慶兄比溢成更高一班，與我住在同一間寢室。他已經到處宣傳當代新儒家熊、唐、牟三先生的學問，也常加入我們的高談闊論。鍾慶兄有過人的才氣與熱情。有一天晚上，他帶著我們到永和戴老師的寓所拜訪。當然他早就說明，戴老師雖然講授國文文法，是語法專家，其實對中國哲學義理的造詣很精深，是牟宗三先生在師大任教時培養出來的弟子。記得那次晚上在永和，戴老師、師母對我們非常親切，可能他們對香港僑生有特別的關懷吧！我當時感受到戴老師有一股清逸之氣，言談條理清楚，而又含蓄委婉，一見之下，就令人佩服，願意以他為師。此後我們就常向戴老師請益。我們幾個同學可謂是從下而上，在師大推動義理之學的研究，很有一股氣勢。當時戴老師很喜歡我們這一努力方向，常常不吝惜時間參加我們的讀書會，或公開的學術座談。除了我們之外，黃漢光、林士琛二兄與我班上的許多同學，如李正治、李元治、呂世露等，也常常參加。當時教育系有幾位喜歡念哲學的同學，也常來參加。記得有一次戴老師強調儒學是生命之學，是表現「活潑潑」的精神的，給與會的同學留下很深的印象。廖鍾慶兄在他念大三時的假期回香港，想去見牟宗三先生。戴老師交代他，說你是我的學生，牟老師就會很高興接見你。事實果然如此。這也開啟了鍾慶、溢成兄和我先後回香港唸研究所，師從牟先生或徐先生的機緣。溢成兄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原本是徐復觀

先生，後來徐先生去世，就改請戴老師負責。

在我念大三的那一年，班上有同學對大四準備來教我們中國哲學史的某教授不滿，對外放話說，如果那位老師一定要擔任我們班上的課程，我們幾個同學一定要嚴格提問，看他是否能應付。後來那位教授就情商戴老師來擔任我們班上的中國哲學史課程。當時戴老師問我們的意見，我們當然是熱烈贊成。這應該是戴老師在師大擔任中國哲學史或義理課程的開始。在大四的中國哲學史的課堂上，戴老師的態度開放，與同學們自由討論，是非常美好的上課經驗。有一天下課後，他特別找我說話，說牟先生已經答應來臺灣講學，希望我與班上的同學，在牟老師到了之後，多去問學，牟先生很喜歡與年輕人接近。大概一兩周後，我們有十多位同學到牟先生暫時下榻的旅館「自由之家」拜會。我在大三寒假時已經在香港拜會過牟先生與唐先生，並上過他們在中文大學一兩周的課，也是鍾慶兄帶去的。這次和同學一起拜見牟先生，聽他論學，更感受到牟先生學問深微。套余英時教授的一句話，牟先生在哪裏，中國哲學文化就在哪裏。牟先生的風采動人，也平易親切，眾同學都樂於親近。由於同學們的請求，牟先生在師大連續做了四次演講，深入淺出地講出他對儒、道、佛三教及宋明理學所以要分為三系的看法。這幾次的演講在師大大禮堂都是爆滿的。當時邀牟先生來臺講學的是中國文化學院的張其昀先生。但牟先生認為，到陽明山上課比較不便，就借師大的教室來上課，於是我們得以在師大上了牟先生一學期的康德哲學的課。通過牟老師的上課和演講，相信當時有緣聆聽的同學，對於中國傳統的哲學智慧與康德哲學的了解，有脫胎換骨的感受。當時戴老師常常在座聽講，對牟先生執禮甚恭。古人所說的老師弟子之情誼、師友的風義，我們在戴老師對牟先生的態度中具體地看到。當時中國文化學院認為，牟先生既然借師大上課，就沒有對他的生活起居有更具體的照料。戴老師曾問我們，是否可以想辦法在我們所租賃的樓房，清空一間房間，讓牟先生暫住。這時還好陳修武教授通知了《聯合報》的劉國瑞先生（好像時任社長）。劉先生早年也聽過牟先生一兩年的課，他馬上邀請牟先生到他府上居住。劉先生對牟先生當然照顧非常細心。

當時牟先生常常從劉先生的寓所走路到我們與潘柏世夫婦共同租賃的浦城街的樓房，與同學們談天。當時常在座的還有袁保新、林鎮國、萬金川、蔡錚雲，以及念文學的王文進等人。在此之前，鍾慶在一次書展中認識了潘柏世、袁保新等。他們討論熊十力先生的學問，談得非常愉快，於是就讓我們師大這幾位與輔大的朋友結緣，大家得以在這次牟先生來臺講學的時候，共同向牟先生請益。這次牟先

生逗留了兩三個月。他回香港後不久，潘柏世提倡辦雜誌，就是一九七五年發刊的《鵝湖月刊》。《鵝湖月刊》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可以說是由於當年此一因緣促成的；誇大一點說，這是一大事因緣。在這個事情上，戴老師的作用非常大。他當時與蔡仁厚、陳癸森等先生不遺餘力地給予幫助。

戴老師一生的經歷很多，當然有許多值得記載的，我只選一些跟自己有關係的稍為說說。戴老師在師大授課越來越有影響力，後來被邀請到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一方面推動儒家思想的普及，另外一方面集中精神研究《易傳》的哲學。他對《易傳》非常有興趣，曾託我在香港找一些大陸學者有關的著作來參考。他對於張政烺教授以數字卦來說明《易》卦的起源十分肯定，在戴老師後來寫成有關《易傳》的專書中對此有所強調。他對於《易》卦的結構、《易傳》的哲學皆有論說，尤其是對其中所涵的憂患意識更有深刻的體會。他認為〈坤卦·文言傳〉所說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精神，應該比用「內聖外王」來說儒家的核心觀念，更為貼切。當然「內聖外王」是儒者所必定關注的主客兩方面，但從敬與義來說對己對人的關心，可能是更為切實的。這也應是戴老師在心性工夫上的心得。此時他對於如何普及儒家的經典內涵，為當代的華人提供傳統的做人做事與嚮往理想的精神資源，尤其關心。

從新加坡回臺後，戴老師繼續在師大講學。但他也承接了時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負責人吳德耀教授的委託，編寫一本《儒學輯要》，希望作為教授青少年了解傳統儒家的要義的課本。戴老師也約了我與岑溢成兄參與撰寫，戴老師負責先秦、兩漢，我負責宋、明，溢成負責清代。內容是以個體關懷、群體關懷及終極關懷三方面，選錄歷代深入淺出、可以吸引年輕人興趣、樂於閱讀的儒家文獻，作出註解與白話翻譯。我們工作了大約兩年，還沒有全部編完，而東亞哲學研究所停辦，於是工作就中斷，這一《儒學輯要》的未完成稿就擱在一旁了。戴老師在前兩年也想到此稿，要我做一些整理。我就請幾位同學幫忙把手稿打字，略做校對，希望以後做一些必要的修訂，再想辦法出版。在戴老師主持中研院文哲所期間，我與溢成及其他朋友常被戴老師邀去參加會議。他在這個期間對當代新儒學的研究在文哲所的生根茁壯，貢獻巨大，此事不必多說。

戴老師退休後，對於上文所說的，儒學經典的普及或活化，以作為華人社會生活的精神資源，是念念不忘的。這期間他對於馬一浮先生的著作與他在杭州的影響，特別感到興趣。戴老師的公子祖達兄說，戴老師成了馬一浮迷，是貼切的描

述。對於馬先生所說的六藝論，戴老師是非常贊成的。他認為，六經的內容就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所能表現的各方面生命涵養的內容，也是作為一個人能夠享受到的全幅生命的意義，因此人的性情的培養，必須始於《詩》，終於《易》。當時我擔任中央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就請戴老師到校演講，並參與指導人文中心活化經典的計畫。他老人家不辭辛勞，多次到中央大學文學院與中文系舉辦的會議及工作坊演講、開會；又編成了《詩經選讀——詠歌與經義結合的探索》的稿本，在該書有關《詩經》的分類說明中，具體表達了他對《詩經》的理解。他認為，《詩經》記載了公元前五百年至一千年，中原地區人民的生活，其中的生活體驗與智慧，有悠久的存在價值，現在的中國或華人社會仍然應該參考。在一個人的生活的各方面，《詩經》都可以提供興發生命、涵養性情的作用。戴老師這本《詩經》選本，篇數選得不多，但已經很可以表達他的構想。而他對《周易》的疏解則是完整的，只是為了傳達他對《周易》的深刻體會，他在生命的最後日子，為了完成著作而付出全幅精神。書寫完了，精力也用完了。這的確是作為學生非常難過的事。

多年前戴老師和我談起馬一浮臨終的詩，說那首詩非常恰當地表達個人的生命存在與天地生化的關係。我想，這應該也可以代表戴老師對個體有限的生命的存在感受。詩云：「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他整首講了一遍，對其中的「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及「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似特別欣賞，諷誦不已，這些詩句應該也表達了他個人的生死觀。個人的生命如同大海中的眾漚，據熊十力先生的哲學，眾漚中每一泡沫形體雖小，存在的時間雖短，剎那剎那生滅，但完全具備大海水的性能；連同馬先生的詩意，就是個體的有限的生命與其表現，雖然在時空上存在很短暫，但也可以完全體現造化的價值與意義。個人生命雖然過去了，但會回到造化的本源，作為後來生命蓬勃發展的資源。個體雖死，但與大海水的不斷生生、不斷湧現成為一體。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經典堡壘的永遠守護者

謝大寧*

轉眼之間，戴老師離開我們已經百餘日了！這幾個月間，世界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臺灣疫情也鋪天蓋地席捲而來。未來幾年間，俄烏衝突形態的代理人戰爭形式，會不會也降臨臺灣，誰也不知道。如果從這個角度說，老師能夠在還算太平歲月中平靜離去，會不會是我們在不捨中的些許安慰呢？

想到這點，就不由得想到，歷史的場域，其基本的特色就是「變化」這個概念。人間總在各種因緣變幻中，生住異滅的變化就是人間唯一不變的真理。我們原本就處在一個充滿危機的世界裏，大家必須耗盡氣力去應付隨時到來的變局，也因此，我們總會忘了人間「常道」的身影，應變之不及，又能有多少時間、心力顧及常道呢？而對於世變的感嘆，也總是更增加了對於老師的懷念之情。我總覺得老師的生命形態是非常特殊的。他生長在比我們這個時代還要亂得多的戰亂年代，但是他的生命彷彿就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安定與堅持，一種對於「常道」的堅持。這種堅持讓他在生活上顯出了特別的嚴肅感，也讓他在學問上表現出對「經典」的特殊關懷與興趣。這篇簡短的紀念文字，就想記述一下在「經典」這個主題下，我與老師的一次互動，以及所思所感！

非常慚愧，我與老師互動的經驗是不多的。這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現實因緣。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次偶然因緣，以及由此因緣所帶來的我和老師的真實互動。那其實是一個現實上只成功一半，但確實有重要意義的一次努力。那次的因緣，就是在老師的指示下，我們一起編纂一套後來不幸因政治因素而束之高閣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輔助教材。那件事我不知道未來會如何發展，那套已經具體成形的教材還有沒有起作用的可能性，但是我似乎有義務該

* 謝大寧，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

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記述下來，也是希望能夠將之當成老師的一項功業，以便後人評說！

那個因緣發生的時間，是在民國一〇一年，馬英九總統當選連任之後。當時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一個通知，說要研議恢復被陳水扁給停掉的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必修課程，我被指定為小組的成員。由於我從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後不久，即承命協助處理許多文史課綱撥亂反正事宜，因此此一工作再度找上我，我也不以為怪。然而沒有想到，當時教育部雖承命研擬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必修課程，但他們竟然為了考量政治問題，而希望將原本以四書為內容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修改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仍維持四書的內容，但降低其分量，另一部分則是要加入臺灣先賢有關文化的論述。對於這個不倫不類的想法，我當即表示強烈反對之意。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本就是屬於「經典教育」的內容，中國傳統當然要以聖人之言為主，怎可因為政治考量而隨意調整？後來在我強烈抗爭之下，總算在新修訂的課綱中保住了以四書為主的內容。

此一過程，當時我曾向老師做了詳盡報告，老師隨即就給了我一個要求。他說，保住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基本內容固然重要，但是它只是一個形式上的要件，老師問我，喜歡我們以前唸書時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科書嗎？的確，早年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科書實在沒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於是，老師就交代我一個任務，他希望我以小組成員的身分，看能否向教育部爭取編纂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教科書的機會。老師告訴我，如果可以的話，他願意領銜邀集國內所有的相關專家，一起來完成這個工作。只有有了一部合格的教科書，這個課程才真正能夠發揮它更大的影響力。

非常幸運的，就在老師交代後不久，趁教育部開會之便，我見到當時的教育部吳清基部長，並當面向他報告了老師這樣的想法。我說，我們保證會請出臺灣最主要的專家來編纂這份教材。雖然當時臺灣學校所用的教科書，都已經開放由書商編纂，教育部已經沒有權力要求使用部編本，可是如果能由教育部出面編纂一部合適的教材，應該還是會有引導作用的。就在我提出此一想法後，沒想到吳部長幾乎沒有任何遲疑，當場就答應了，並交代部屬給予我所有的配合。

在確定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也在老師指示下，邀集了許多前輩以及師友，其中包括曾昭旭老師、王邦雄老師等老師輩的學者，也包括李明輝老師、楊祖漢老師等中生代的學者。最特別的是，我們還邀請了長期在第一線

教學的多位資深高中老師，如段心儀老師等人，組成了一個涵蓋全臺灣大多數研究儒學的學者，以及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的編輯委員會。然後在老師的一聲令下，大家各就各位。當時老師訂下了一個規矩，本著「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原則，由五十歲以下的師友負責各單元的撰寫工作，每個單元都配屬負責的學者與高中老師一起合作，以求既兼顧學術面，也顧全教學面。五十歲以上的學者則負責做審稿工作。這個分工真是非常特別，而這樣的組織能夠得到良好的運作，老師真正扮演了核心的靈魂工作。

當時老師召集大家，還商定了一個最基本的方向，就是我們不再以「學做聖人」這樣的一個傳統經典教育的主題為方向，而是改以「學做君子」作為基本方向，採取一種單元的模式，將「做君子」所需要的不同的人格鍛鍊面向作為各單元的主題。以《論語》部分為例，我們選定的主題包括「親子師友之道、立志與為學、仁為何物、理想的人格、過失與反省、挫折與超越、生活的藝術、品德與領導、人間關懷與政治理想、歷史與文化、生命的尊嚴與傳承」等等。在這些主題之前，則各有一篇對孔子、孟子生平所做的介紹，比如對孔子的介紹就以「一個君子的誕生」為題。《學庸》則因為它們的確比較有難度，所以採取比較簡化的方式處理，僅以各一單元的模式，做比較整體的介紹。經典的篇章則以打散的方式，依照各個不同的單元主題重新安排，但核心仍是以經典文句為主要的導引，而不是由編纂者的詮釋為主來撰寫。這些當然都是有進於傳統教材的。這樣的一種編纂方式，既照顧了經典本身的內涵與歷朝歷代的研究成果，保持了學術上的客觀性，也充分從人格涵養的工夫面向出發，著重於經典實踐精神的發揮。我必須說，這樣一種架構的定稿，背後真正顯示了老師在經典上的長期浸潤，與在自我涵養上的工夫鍛鍊。作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老師在這樣的架構上，表現了他對這個學問的具體承擔！

老師對這一教材還有一個創新性的做法，就是在每個單元的撰寫時，要求一定要包括教學上的情境設計，以使教師與學生都能出入於古典與現實之間，完成一種情境的轉換，讓經典的智慧能夠順適地融入具體的生活世界。同時也在每一個單元中通過問題與討論、延伸閱讀等等方式，將經典與生活做出更好的連結。這種充分考慮教學現場，連結傳統與現代的方式，不只是以前的教材所不曾企及的，也是對經典生命的繼繼繩繩，所做的一種有創意的詮釋。平心而論，這個教材的編纂理念，的確是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所有類似教材中，最具有創意，也是最具有經典意

識的一部作品。這方面的考慮，當然是基於老師當年參與部編本國文教科書編纂的經驗。而在這樣的編纂理念中，老師還更要求大家不只要編出一部好教材，還得為所有的老師編好教師手冊。這的確加重了編寫上的負擔，但是它的好處當然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教學者未必如編寫者般，那麼熟悉相關材料，教學現場的老師們負擔也重，所以通過一部詳盡的教學手冊，對於教學的幫助無疑是巨大的。特別是這部教學手冊，多數是由有豐富教學經驗的高中老師所撰寫，這對使用者當然有更大的助益。

經過一段時間的撰寫，在初稿完成後，就進入審稿的程序。這個過程對撰寫者還真有點像博士論文口試一般，甚至是更嚴格與可怕的过程，因為每份初稿都得事先交由審稿的學者大家各自審閱，然後一個一個提出意見，字斟句酌，沒有一個字能夠馬虎。當時每次審稿會議，大概至少都是七、八個鐘頭，老師從頭盯到尾，從不缺席。在老師這種態度與要求之下，沒有一個人敢偷懶，撰寫者也得為每一個文字負責，交代其每個訓解的來龍去脈。曾經經過那個過程的師友，想必都記憶猶新吧！當時，我本來是在審稿團隊裏的，卻也因為一些緣故，被老師指定加入撰寫團隊，撰寫孔子、孟子的生平。那真是我寫得最戰戰兢兢的稿子，如今回想起來，其實還真是挺有意思的一段經歷。而每次審稿會議，老師以八十高齡，每次七、八個小時下來，老師說他每次會議後，回家都得躺三天。老師如此拼命，我們除了不捨，更多的則是感動！

就這樣匆匆之間，約有兩年的時間左右，我們終於完成所有的稿子，開始要進入具體推動的階段了。在老師的指導與督促之下，那兩年真是多虧有林月惠、閻鴻中、徐聖心等多位老師的全心奉獻，讓整個教材都能夠在預期的進度中向前發展。不過，一個我們很不願意看到的狀況，逐漸開始對這個教材的實質推廣工作產生了影響，那就是臺灣從民國一〇三年之後政治場域的快速變化。我們的教材要開始積極推廣的時間，已經到了馬政府的末期，跛腳了的馬政府能夠給予的協助已經越來越少；隨後就是政黨輪替，輪替後我們再要得到新政府教育部的幫忙，也就更困難了。剛開始，我們還可以通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資源中心，形成一些具體的推廣計畫，比如說運用我們所編纂的教材，進行種子教師的培訓與教材的試教等工作。此後，隨著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推動，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這一課程終於進入名存實亡的階段，連課程都基本上已經沒有地位，這個教材在現實上當然也就面臨了束之高閣的命運。由於版權等種種問題，這個教材基本也沒有出版的機會。時耶？命耶？

也就難言了！

以上我大致記述了有關這份教材編纂的大概經過。由於估計這個教材終將湮沒無聞，為了讓所有曾為此教材奉獻心力的老師、師友不至於徒留遺憾，還是必須還這份教材的歷史面貌，讓後人可以稽古鉤沉，所以我也不嫌辭費，交代了這份教材的內容與來龍去脈。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最讓我有深深感觸的，就是老師從頭到尾所流露的那種經典意識，以及對經典的生命承擔。從這裏我看到了一位典型的傳統儒者，而不只是一位以儒學為專業的學者。從這個教材編纂工作的提出，我就強烈感受到老師的那種經典意識。老師當然了解，臺灣這二、三十年圍繞課綱問題各種爭論，及其背後的政治背景，也很清楚這個工作在臺灣現實環境中的重重阻力。但是老師那種「知其不可而為」的精神，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與承擔，讓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什麼叫作「以夫子為木鐸」的況味。在整個教材編纂的過程中，老師所顯現的熱情與一絲不苟，即使一字一句，都必須具體交代出處，絲毫不容含混、不容隨意詮釋的態度。這不只是嚴謹的學術訓練所養成的習慣，更是將經典視為自己生命意義之所在的一種人格上的擔負，這些都是我們這群參與者所共同感受到的。也因此，這個過程我們雖都花了相當的精力，但似乎沒有什麼回報，可是我們卻都深深感受到了一種來自生命的啟發，這才真是無價之寶啊！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老師在初稿完成後，交代我要在教師手冊的前面寫一封給所有使用此教材的老師們的一封信，向他們說明這個教材的意義。老師這個功課，真是讓我陷入了焦慮之中，整整一個禮拜沒睡好覺。這真是不好寫的一封信啊！我斟酌再三，好不容易在一週後交了稿，然後忐忑了好幾天。幾天後，老師看到我，對我露出了滿意的笑容，還拍了我一下胸口，對著師母說了一句「我知道他行的」，我才放下了忐忑的心。這大概是我跟老師這麼多年，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個鏡頭吧！老師通常是嚴肅的，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即之也溫」的感覺。師弟子之間，這種感受應該是最溫馨的吧！

老師已返道山，來也淡泊，去也坦然，一生與經典有著最直接的生命互動，也因為經典的厚度，而撐起了老師生命最厚重的面向。今即以此蕪文，記述我們師弟子之間的一次真實互動，並以「經典堡壘的永遠守護者」之贊語，作為對老師的紀念！我相信，老師在經典中悠遊一生，絕對可以體會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之境界的，而這點也給了我最深刻的啟發！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感念業師戴璉璋先生

林鎮國*

戴師於一月八日過世，隔天接肇亨來訊後，隨即致電月惠，詳問情況，得知是在睡夢中離世，甚為安詳，並未受苦，乃稍感安慰。我最後一次看望先生和師母，是和月惠、明輝兄及劉師母一起前往至善安養中心。那天（2019年8月27日），戴師談興甚佳，大夥兒還開車到陽明山餐敘。印象最深的二件事，一是談到他每天勤於《周易經傳疏解》一書的撰述，二是明輝兄詢及余英時先生甫出《回憶錄》中提及文哲所人事案的實情。關於後者，我雖剛看過該回憶錄，由於是所外人，只能旁聽，沒有插話。那次見面之後，全世界隨遭新冠疫情襲擊而變了樣，再接訊息，已是兩隔。

我在一九九一年返臺任教政大哲學系，雖和文哲所常有學術活動的往來，但未有太多機會親近戴師，一來是彼此都忙，二來是個性上素來不懂得親近師長輩，也不懂得逢年過節，請安問候的禮數。一直到戴師退休茶會上，才在諸多同門前，略表對師恩的感念。也還記得有一次，戴師宴請翟志成先生，邀我做陪，而我卻從未宴謝老師。如今想來，文化傳統不能空講，必須體現在人倫日用之間。戴師戰亂中來臺，那一代仍保有傳統的文化底蘊，和我這世代的人文素養畢竟還是有所不同。

一九七三年我自臺灣師大國文系畢業。從大三起，開始接觸梁、熊、唐、牟、徐諸先生的學問，也去臺大聽過方東美先生的課。當時尚未有「新儒家」之名。該名號來自張灝教授一篇收在《變革的限制》的英文論文標題，後經拙譯後，才出口轉內銷，浸浸然始有「學派」意識。實際的情形是，約在一九七四年我回師大讀研究所之後，一群來自師大、輔大的年輕學子，宗熊、唐、牟學統，以《鵝湖》月刊為平臺，上接牟先生在臺門人，包括師大戴先生、東海蔡仁厚先生等人，遂有後來

* 林鎮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

在東海大學、中研院、中央大學開枝散葉，蔚為大宗的發展。

在師大國文所期間，因兼課謀生，讀了三年。一九七六年，要寫碩士論文，遂請戴先生擔任論文指導。戴老師並未在師大研究所上課，我也沒上過他的課，他願意收我這學生，讓我非常感激。當年師大國文系由師承黃季剛考據學的林尹先生主持，和宗宋明儒心性之學的熊、牟系統，彼此扞格，門戶大不相同。戴師在師大隨許世瑛先生治文法學。我在大三時，修過許先生的聲韻學。那時許先生的眼睛瞎了，由一位助教牽著上講臺上課。教材是董同龢先生的《漢語音韻學》，屬王力的系統。印象最深刻的是，許先生視力雖弱，看不見教材，上課時每每指書本第幾頁，內容如何如何，其熟稔程度令人驚嘆。戴師真正的學問根底其實來自王力、許世瑛一系，是真正的樸學。現今人多視先生為新儒家，僅見一隅，未見全貌。

我大約用了半年時間撰寫論文，題目是「莊子轉俗成真的理論結構」，主要的想法受到牟先生的影響。當時每寫完一章，必親往戴老師在金門街的公寓住所，請老師過目指正。當時只有電話，不像現在可用電子郵件傳遞文稿，甚至視訊討論。一般大學老師也沒有研究室，多在家裏指導學生，成為那世代的記憶。

見面通常在戴師金門街家裏一間書房。那時戴師母也在教書，小孩讀小學，可想像其中年人生的壓力忙碌。這只有到了同樣的人生階段，才能體會其中的辛苦。當時，他家裏請了一位幫忙家事的太太，下午去時，常會遇到。

碩士論文撰寫頗為順利，口試時請臺大中文系張亨教授擔任審查委員。戴老師和張老師是老交情，我也因此得以有受教於張先生的機緣。穿插一小段故事：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前後，我在高雄文藻外語專校教書，經廖仁義之邀，在他編輯的黨外雜誌《新生代》發表一篇文章，回應疾風幫的攻擊。不知張先生如何知道（因為文章是用筆名發表），有一次北上，經友人轉告他的告誡，應以學問為重，不要枉送青春前途。事隔多年後回想，才真正體會他們那世代的閱歷與智慧，也感激其對後輩的關心。

美麗島事件是我那世代晚到的啟蒙，真真實實的衝擊，改變了我看這世界的方式，但也因立場不同，淡離了年輕時代的學圈。哲學追求真理，實際上卻無法脫離意識型態的糾葛。此現象舉世皆然。八十年代在北美看到重審海德格案與京都學派哲學，讓我反省了哲學與政治之間的複雜性，也認識到還有比政治更根本的層面。對戴老師他們那世代來說，一九四九年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就好像對我這世代來說，一九七九年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一樣。時隔三十年的「事

件」有太多的相似性，只是人在局中，還沒有足夠的時間拉出觀照的距離。

在我的心目中，戴老師為人剛毅正直，內心卻十分溫暖。他的學問表現在儒學、玄學和《易傳》，還有早期的文法學的研究上。很慚愧的是，雖然我的碩士論文以《莊子》為主題，卻沒有繼續在這領域用功。他晚年致力於以性理、玄理、空理開啟人文價值的世界，正是試圖為這紛擾的世界指出了一條超越的道路，一條人文理想主義的道路。他這一生可以說是儒道精神的體現。今天在這裏，感念師恩，重要的是繼續發揚這人文理想主義的精神。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戴璉璋老師對我的教誨與影響

黃瑩暖*

二〇二二年元月八日凌晨，業師戴教授璉璋先生於振興醫院安詳辭世，享壽九十。老師從發病到辭世，不到一個星期，過程的變化太快，令我在驚愕之餘，十分痛惋不捨，亦頗有失怙之感。這份傷痛，自老師喪禮結束至今，依然在我心中盤桓久久……，要提筆寫這篇文章，於我而言是萬般艱難。因為，要寫出戴老師數十年來對我的教導與影響，實非我的拙筆所能勝任，只好竭盡棉薄之力，勉強書寫一二。

一、我的經師：弘毅終身，任重而道遠

一九九〇年，戴老師甫自新加坡講學回臺，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之後，又於國文研究所開設「古代文法研討」、「魏晉玄學研討」等課程。這些都是我追隨戴師學習的課程。不論修習哪一門課，我總需要在課前充分預習，在課堂上凝聚全副的心神，眼、耳、身、意並用，才能勉強跟得上老師講課的速度。因為無論是中國文法的邏輯還是中國哲學的理論，講授者要能清楚析明之，皆是不容易做到的。而戴老師總能寓義理於文法分析之中，輔文法於義理講授之際，將其中的脈絡與意蘊，抽絲剝繭，條分縷析，娓娓道來，款款攤展，令愚鈍的我在上課的辛苦追趕之餘，心智總在不覺之間漸次豁然，終至開朗，心中也隨之滿溢著求知的喜悅！不管哪一門課，戴老師的課程內容總是非常豐富紮實，但老師也總是行雲流水，優游任運，在緊湊的時間內將課程做最完滿的教授。後來，我發現：老師無論是在課堂上講課或日常談話，甚至在電話之中，其清晰的口條總

* 黃瑩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如酣暢的流水般，行運無礙，條理井然，而且言談之間竟然連一聲「嗯」、「哦」的語助詞都沒有！這充分顯現了老師異於常人的清晰思維與深厚學養，若用「出口成章」來說明戴老師的言語，實在再恰切不過了！個人任教於大學已逾二十年，時常注意自己的授課與日常言語，自覺實在與老師差之千里，十分汗顏！

在研究所修習戴老師課程的歲月中，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那就是一九九〇年九月到一九九一年六月，老師在國文研究所開設兩學期的「古代文法研討」課程。當時修課學生於古文法的訓練基礎相當薄弱，於是，老師不厭其煩卻又畫龍點睛地賣力教導，同學們亦把握有限的時間拼命學習。記得該堂課的下課時間是晚間六點鐘，但每回下了課之後，同學們總是蜂擁而上，圍著講桌搶著提問，絲毫沒有讓老師休息的意思，而且往往問到晚間八點尚不肯罷休！老師牽掛著家中守候的師母，卻又難卻同學們好學的盛情，只好一面踏上返家之途，一面繼續著與同學們的討論；而同學們也一路圍著老師，邊走邊求教，就這樣一路走到了羅斯福路與金門街交叉口，老師勉強喊停為止！這一學年的文法課，每週上課情況均是如此，毫無例外。戴老師高度的教學熱忱與師生之間對學問的熱切追求，造就了這份特殊的經歷，也在我的心中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回憶。

戴老師是我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的指導教授。在我撰寫這兩本論文時，皆是一面擔任行政工作，一面利用零碎時間寫作，因此於畢業時限上承受著不小的壓力。而同時，在我的這兩段寫作的歷程中，戴老師亦是一面擔任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主任一職，需要負起創建文哲所的重任，並處理所內大量的問題與瑣務，一面又要回師大授課；在如此繁忙的情況下，他還設法找出時間做學術研究。於是，老師就在文哲所籌備處主任任內，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並出版了《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一鉅著。該書是繼牟宗三先生的《才性與玄理》之後，對於魏晉玄理更有開創性的闡釋之作。而戴老師在我論文寫作期間，亦深解我的畢業期限壓力，因此，每回總在我以「快捷」郵件將論文草稿寄給老師審閱的隔日，一定會收到老師同樣以「快捷」郵件寄回的論文，而且，在我的文稿上，每回總有老師鉅細靡遺的批閱字跡，足見老師對於我的論文，是字字句句仔細審閱、修正，並給予意見的！老師負重而行遠，但每一步都走得認真而盡心，盡力而盡瘁，教我對戴老師生起由衷的尊敬！

二、我的人師：身教與言教兼備

一九九〇年三月，教育部忽然頒布命令，指定某幾所大學試行「學士直升碩士班」計畫。當時，師大國文研究所是被點名試行的對象之一。也許是顧慮到種種因素，並為了取得公信力，國研所在試行這項計畫時，決定採用最嚴格的考試方式：要求考生提出與博士學位論文計畫一模一樣的計畫書，並須通過七位教授嚴格的口試關卡。由於教育部的命令頒布得十分突然，當時甫自師大結業、正在國民中學實習的我，接到通知時完全不知所措，對於這項考試內容亦完全陌生，甚至連「博士學位論文計畫」是什麼樣子都沒有見過。但距離考試只剩下不到兩週的時間，我只能硬著頭皮，盡力準備應考。還記得考試當天，我見到「坐鎮」七個考場的每一位，都是系所裏公認學問最淵博的「大老」級教授，其中包括了戴老師在內。由於戴老師平素上課不苟言笑，對學生的要求亦甚嚴格，因此到了戴老師這一關時，我緊張得渾身冒冷汗。進去之後，老師竟然露出和藹的笑容，親切地針對我的研究計畫提出了許多問題。雖然每個問題都鞭辟入裏，直指要害，但老師溫和的語氣、專注的聆聽與切中核心的點撥，卻神奇地使我的心神放鬆下來，腦袋也隨著老師的提問而愈來愈清晰敏銳，應答時也愈來愈流暢順適……。本來是我應試時最害怕的一關，卻成了令我最震撼的一關，因為我第一次見到了與同學們傳言中完全不一樣的戴老師！在那場半小時的口試中，戴老師的考官威儀、教師典範與君子風度，完全融為一體，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風範！我終於看到並完全體會《論語·子張篇》中，時人對孔子評價「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現代真實版的體現！先前初讀此章時，很難將其中的三句話湊泊在一起；但戴老師渾然天成的儀範，使我不但瞬間懂得了經典中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在戴老師身上親見了聖賢人格的高度！牟宗三先生曾言中國哲學是「生命的學問」，這份學問必須通過親身體踐，才得以發露彰顯；而我在戴老師的身上，親眼見證了這份彰顯的光彩！同時，這份懾服人卻感動人的光彩，也為我的人生立下了良好的範型。

一九九一年初夏，本系舉辦了助教聘任甄選。依當時的法規，助教即是「種子教授」，因此甄選助教即是為本系甄選未來的師資。依本系當時不成文的慣例，自是以歷屆第一名畢業生為優先考量人選。那一年，我沒有提出甄選申請。甄選結束之後的某一天，戴老師在下課之後，私下問我原因。我如實告以母親的期望僅是要

我成為中學教師。老師聽了，神情嚴肅地伸出手指，在面前的地上虛畫了一條線，說：「《論語》裏，孔子回答冉求說：『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還記得這句話嗎？」我點點頭。老師接著說：「依據我對妳的了解，妳有無限的潛能，而此時（指助教甄選）正是妳更上層樓，益加充實發揮的機會。這個世界並沒有任何人阻擋妳抓住這個機會；而妳卻在眼前畫了一條線，告訴自己：『我的實力僅止於此，我不再前進。』如今的妳，無異是在畫地自限！今天我找妳談話，就是要告訴妳：『妳的潛力無限，千萬不要畫地自限！』」此時，老師的語氣雖然嚴肅無比，但我感受到了話語背後的疼惜與鼓勵之切，我的眼淚不覺間已在眼框內打轉。然而，老師依然以一貫的嚴肅語氣接著說：「但是，妳聽好了：明年若是妳回系裏提出甄選申請，我是絕對不會幫妳的！連一句好話都不會為妳講！一切依照程序處理，我的立場完全中立，一點也不會為自己的學生護航！」我聽了，原本在眼框內打轉的眼淚突然止住了。老師說：「當年我回師大母系任教，無端被師長們彼此的恩怨波及，而受到千般萬般莫名的阻礙。當時系裏其他的老師為求自保，沒有一位願意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因此，自始至終，全憑我自己一個人，去克服一個又一個的難關，最後終於為我自己拿到聘書。現在，妳也一樣，一定要勇敢，為自己站起來，不要寄望我會幫妳，更不要攀緣倚勢！妳要憑藉自己的智慧與力量，去克服難關，用實力拿到屬於自己的未來！」老師說完話，便道別離去，留下站在原地的我，心裏一個字一個字釘牢了老師的話：「不要畫地自限」，「要靠自己的實力」……。

老師用自己流亡學生的生命歷程為例，告訴我切莫輕看自己的潛能，鼓舞我對自己要有信心，要帶著勇氣和衝勁，面對生命的挑戰，開闢自己的人生。因老師的啟導與鼓勵，次年，我回到母系服務，並慢慢在學術研究上嘗試開闢自己的路徑。在我婚後的某段時期，遇到許多挑戰與障礙，心中備感困擾與壓力，於是向老師求教。老師知情之後，立刻以英國女作家吳爾芙為例，鼓勵我：無論如何都要堅持自己的立場！尤其身為女性，更要捍衛自己的人生與自我，萬萬不能退縮或屈服！當時的我，在心緒紛亂之餘，聽到老師的一番話，登時茅塞頓開，不但得到了堅持下去的勇氣，心中也更加敬佩老師觀念的開明與智慧的通達！老師於我而言，不啻生命中的明燈，在昏暗無助之時，為我照亮前路，指引方向。

戴老師任職文哲所籌備處主任時，在繁忙至極之中，仍然堅持學術研究，著述不輟。我請問老師是如何做到的。老師回答：「雖說文哲所目前仍屬籌備階段，我也不過是籌備處主任，但本所屬於國家最高研究機構，身為主任，如果以公務繁

忙為由，不持續做學術研究，沒有以身作則，又有什麼資格帶領文哲所的同儕，帶起所裏的研究風氣，使文哲所成為各研究機構的表率呢？」由於對學術的熱忱，對「生命的學問」的重視，以及對文哲所的責任感與對自我的鞭策，老師在百忙之中依然成就了他的學術研究成果。當時的我聽了之後，深切自省：老師這麼忙碌勞累，都能勤研不斷，身為一個小助教的我，又有什麼藉口不好好讀書做學問呢？老師給我的信，一如他言簡意賅的言語風格，信末短短一句「行政工作案牘勞形，注意保重身體，莫忘讀書」。「莫忘讀書」，是老師以其身教，對我最語重心長的提撕。

老師與人相處，總是秉持君子之風：與友好者不結黨營私，與不投契者和而不同。但於公務上，則是堅持原則，奉公守法，守經達權，不畏任何威逼利誘，而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則，處理複雜棘手的問題，以此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令我敬佩之至！請問老師何以能如此，他答以四字：「無欲則剛。」「我所做的事、所堅持的原則，完全為公眾著想，秉持法規程序，絲毫沒有個人私欲夾雜，亦對名位毫不戀棧，因此能立穩腳跟，不畏不懼，而具有公信力」。在這個往往「只看黨派，不論是非」的滾滾紅塵中，要做到如此清正不阿，何等不易！俗言道「西瓜偎大邊」，身處人群社會之中，為人處事不結朋黨，不靠勢力，而待人存誠，做事盡責，其餘得失利害則不罣懷；但並非委屈受辱，而是以俯仰無愧對之，並懂得保護自己不受欺壓，這是濁世清流的戴老師帶給我的身教與言教。這樣的典範，總是在我人生一次又一次的難關中，支持著我，一步一步帶引、陪伴著我，從黑暗中走出光明。

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能夠成為戴老師的學生，追隨他學習，無論是為人、處事，抑或是學術研究的態度與方法，我從戴老師身上所學習到的，遠遠比我所能書寫出來的多太多了！我何其幸運，今生得以拜入這樣的君子賢德門下為徒，不論於學術、於人生各方面，都獲得老師的愛護與指導！但我又是何其慚愧懊悔，未能精進努力，以祈無忝師門於萬一！老師前半生顛沛流離，全憑自己的力量奮發前進，而得以安身立命，進而受到學術界的尊敬。甚至在安養院最後的歲月裏，戴老師依然精勤著述，以八十九歲的高齡，完成了《周易經傳疏解》這部鉅著，為《周易》研究更增添了一部精彩

的著作，也完成了老人家的最後的心願。該書出版時，戴老師欣慰不已，直言此生圓滿無憾！其後，便安詳辭世，為他的人生畫下至真、至善與至美的句點。我身為戴老師的學生，雖然於情感上依然哀傷不捨，但於此也了悟到：當初受老師指導，學位拿到了，與老師的關係卻更密切，從老師之處所學習到的也更多了。如今，老師仙逝了，我與老師的連結一樣不會斷，因此我應該謹記師訓，鞭策自己於進德修業上更加努力，以祈向老師留下的典範趨近，期能不負我亦師亦父的戴老師的愛護與教誨。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敬悼戴璉璋老師

廖鍾慶*

一九六九年秋，我以第一志願考上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記得當時我只填了五個志願，順序分別是師大國文系、師大歷史系、臺大中文系、臺大歷史系與政大中文系。因為當時師大國文系教授陣營鼎盛，大概出了十多位國家博士之後，其他的大學才跟上來。

平平淡淡地讀完大一之後，大學二年級還沒有開學，學生宿舍裏已經頻頻謠傳說，大二的文法課教授，死「當」三分之一，補考三分之一，只有三分之一能過。第一節上戴老師的文法課時並不理解宿舍裏為什麼謠傳得那麼恐怖，因為戴老師溫文爾雅，國語發音清晰動聽。後來跟學長馮耀明兄談起戴老師，他對戴老師的印象也是覺得，非常喜歡聽他的國語。幾個月後，我在隔壁寢室同級不同班的一位蕭姓同學的書桌上看見一本《讀經示要》，便好奇地問他這是什麼書，他說是戴老師推薦的書。我翻閱了好幾頁，問他可不可以借我回去讀一讀，他答應了。我回到自己寢室，一讀便不能罷休，第二天就去廣文書局自己買了一本。這是一本義理之學的書，跟文法課的內容毫無關係！一星期後，我已經把這本《讀經示要》讀了一大半，而戴老師正好在我們班上也向我們推薦了熊十力先生這一本書。因為這是一本讓我振聾發聵的好書，所以，我趁戴老師下課後便走到黑板前問大家說，我買這本書是原價，但如果大家想買的話，我願意去廣文書局交涉團購折扣價。四十多位同學簽名同意了，我就拿著四十多位同學的名單去廣文書局交涉，獲得了六五折的價格。我自己先墊了錢，提著兩大摞書坐計程車拎回師大宿舍。因為戴老師，因為我，師大國文系二年甲班每人都有了一本《讀經示要》，並且我不斷大力鼓吹大家一定要好好讀熊先生的書。

* 廖鍾慶，戴璉璋教授早期於臺灣師範大學的學生，目前定居瑞典。

我的文法課沒有被死「當」，也沒有補考，但也只得了七十幾分，原因是我考卷上的字寫得很大，有讓旁邊同學抄的嫌疑，已被監考老師警告了一次，過了沒多久，整個考試大概才考了二十多分鐘，監考老師便把我的考卷沒收了，並且把我趕出了考場。事隔現在已超過五十年，我仍然記得當時的五道考題中有一道題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還有一道題我根本來不及寫（語句文法分析）。幸好我只要及格，根本不在乎得多少分。但是，這位教文法課的戴老師卻開啟了我接著閱讀熊先生所有著作，以及唐君毅老師與牟宗三老師所有著作的歷程。

大三時，我的學術方向已傾向於義理之學，在校園裏常常偶遇戴老師，也因倍感親切而會主動地趨前向他請益一些義理之學的問題。次數多了，他對我也有了一些印象。放暑假之前，在校園裏又遇到戴老師。我問他，暑假我回香港想去晉見牟老師，跟他說我是您的學生，好嗎？他說：「好！牟老師一定願意接見你。」整個暑假我都住在新界烏溪沙，當時出市區九龍需要先乘船再轉火車，所以，整個暑假我只先後晉見牟老師兩次。暑假後在校園裏見到戴老師，他問我：「牟老師來信說，你的學生廖鍾慶很霸氣，很驕傲，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我回答：「很霸氣，大概是因為我跟他說過，一個人去廣文書局幫全班同學買《讀經要》與到處大力鼓吹讀熊十力先生的書有關吧！很驕傲，大概就是他問我暑假為什麼沒有來研究所上他的《易傳》課，我說：我還用去聽課嗎？您不是在《心體與性體》裏講得都很清楚了嗎？牟老師接著問道，那『無成有終』是什麼意思？我說：成萬物者乾，終萬物者坤。乾是創生原則，坤是終成原則。他就沒有再問其他問題了。」戴老師也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

大四時，在師大第六宿舍一二一八寢室非常熱鬧，一群愛好義理之學的人住在一起，難免會經常高談闊論，爭辯哲學問題。我覺得不過癮，開學不久，我就找戴老師商量，我們想申請成立「人生哲學研究社」，每週六定期聚會。可惜當時因為討論「哲學」屬於敏感的話題，而這類社團當然申辦不成。但承師大主任教官丁教官答應，我們每星期六下午可在師大教室開會。當時戴老師與曾昭旭老師都曾與會指導我們。社團辦不成，但我們仍每週開會，爭辯哲學問題。一九七三年四月分，大四下學期我寫出〈黃岡內聖學述——《新唯識論》研究〉作為我的大學畢業論文。當然學校並沒有這一方面的要求，只是我自己覺得有這個自我要求而已。論文寫出後，讀過該文的前輩學者分別是徐復觀先生、牟老師與唐老師，巧的是他們都是熊先生的弟子。徐先生不同意熊先生的「翕關」理論，當時在劉孚坤教授家，我

嚴肅地據理反駁。牟老師與唐老師則非常稱讚。記得第一次遇見余英時先生時，唐老師是這樣介紹我的，他說：「這是我的學生廖鍾慶，他是熊先生的專家。」幾年之後，牟老師在臺大當訪問教授，戴老師叫我去學人宿舍陪他住。某次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來訪，牟老師是這樣介紹我的，他說：「這是我的學生廖鍾慶，他是熊先生的專家。」原來，我在兩位老師的心目中是熊十力先生專家！相信戴老師心裏一定很欣慰教出這樣的學生吧！

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從學於唐君毅老師與牟宗三老師，我有空時會給戴老師寫信，講在香港上學讀書的事。我得到了碩士學位後便回臺灣，繼續在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原想師從謝幼偉先生治西方哲學，但他自一九七五年秋已不再開課。失望之餘，我對中國文化學院的課也興趣索然。蒙戴老師推薦，把他在淡江學院中文系「中國哲學史」的課讓給我教，另外在英文系增加一門「哲學概論」，於是，我開始在大學任教。

戴老師其實可說是我在哲學方面的啟蒙恩師，也一直很照顧我，我非常感念。我留學瑞典，後來變成學留。期間他還推薦我去新加坡而未果。但他的熱心照料卻一直讓我深念不忘！

一九四九年戴老師與兩位同學乘船由大陸到臺灣，接著國共內戰迅速席捲全國，兩岸處於敵對的狀態，因此他無法回老家浙江麗水。有一次閒聊時戴老師告訴我，他的老家原先是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因日寇侵華，局勢動盪，他父親便把生意結束，搬回老家，坐吃老本。到中共建政後，他家早已經變成一般無產階級的貧苦人家。所以，他們家的成分便很好，而沒有遭遇到任何政治清算，妹妹還因此能考上醫學院，當上了醫生。一直到很後來，他才敢透過香港和新加坡的朋友把信轉到浙江麗水老家，拍了一些家庭照片附在信裏，衣著也盡可能簡樸無華，生怕對老家家人會有不利影響。生命本來就像謎一樣費解，誰能料得到，十七、八歲坐一趟去臺灣的船，便一去數十載而背井離鄉？誰又能料得到，一個毫不相干的文法課老師會教出一群立志為往聖繼絕學的人？雖然我在大學三年級時學問方向已傾向於義理之學，但是，我在大學的最後兩、三年仍然幾乎每天晚上都上師大圖書館三樓閱覽圖書室，獨自一人研讀臺大《文史哲學報》的史學論文。我對史學的興趣仍極大，直到我寫出〈黃岡內聖學述〉才能確定自己要讀哲學研究所。假如不是戴老師的啟蒙，假如不是讀熊先生的書對我產生振聾發聵的作用，我想我很可能會報考歷史研究所。也慶幸自己走上哲學研究之途，最近這十多年來才真正知道最「有用」

的學問原來就是哲學！這要謝謝熊先生，更需要謝謝的就是戴老師！

最近常上網訪浙江麗水，秀麗的甌江，迷人的山水與處處綠意盎然，相信戴老師的老家麗水是大陸少有屬於空氣特別清新的地方之一。我也找到戴老師麗水家鄉人講的麗水方言來聽，對我來說，這跟戴老師動聽的國語發音真有很大的落差。和平東路一段上的師範大學大門過了馬路就是臺北市的麗水街。青年時代、中年時代的戴老師一直生活與工作在師大國文系，我想他每次經過麗水街，肯定會特別想念他的家鄉而興起濃濃的鄉愁。在割裂的時代，知識分子最強烈的感受就是無力感。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語要》中經常感嘆地說，要為亂世族類留善種，文化生命能得善種之留存，便後繼有人，並續此慧命。上天選擇了戴老師承繼了這中華民族文化生命之慧命，在師大國文系，我們因此而接上了這慧命。願此光輝之慧命永續不墮，願戴老師在天之靈永得安息！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懷念戴璉璋先生

郭齊勇*

戴璉璋先生(1932-2022)是忠厚長者，是我們十分敬重的前輩師長。元月十三日，我接到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月惠教授的電話和電子郵件，她告訴我：「我們敬愛的戴璉璋老師於一月八日凌晨一點十六分辭世。」她說：「一月七日上午，師母與我到ICU病房探望戴先生時，他精神很不錯，還談笑風生。師母與我都放心，主治醫生也樂觀。但一月七日晚間十一時，心臟的狀況突然急轉直下，師母與老師都放棄插管急救，老師安詳地辭世……。」月惠說：「戴先生一生『無欲則剛』，是儒者的典範……。」

我當即回復月惠教授：「驚悉噩耗，甚為震悼！戴先生是在下與武漢大學同仁十分敬重的前輩，他的辭世，是國際中國文化與哲學界的重大損失。戴先生在《周易》哲學的研究方面，極深研幾，有出色的貢獻，斐聲中外。戴先生的學問人品、精神風範、音容笑貌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同時，吾友李明輝教授也告我訃聞。之後，明輝教授又約我寫此小文。

我多次到臺北南港中研院文哲所出席會議和做研究，承蒙戴先生的熱情接待，內心十分感激。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至十二日，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在敝校召開。此次會議，盛況空前，有來自海內外的一百四十餘位學者參會。我們有機緣在武漢接待戴先生一行。非常幸運，會前特別期待的願望實現了——作為當代新儒家重鎮的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蔡仁厚與戴璉璋先生都來了。當時，他們五位先生同時到場、連袂講學，是很不容易的。應我的邀請，戴先生在大會作主旨報告，會下又為大學生們做了演講。我有幸陪同戴先生與夫人、劉述先先生與夫人等到武當山一

* 郭齊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國學院教授、國學院名譽院長。

遊。可惜當時高速公路沒有修好，坐的是大交通車，路途顛簸，然戴先生等興致很高，都登上了金頂。回程途中，我陪客人們參觀了諸葛孔明隱居的襄陽古隆中。

我深深地懷念戴璉璋先生。他是一位低調謙和、言行一致的當代大儒！一想到戴先生，我的腦海就蹦出這幾個字：經典、人格、教養。

戴先生對中國經典，特別是《周易》經傳的詮釋方面下了極大的功夫。他的大著《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即是在文字學、文獻學基礎上對《周易》哲學義理作深度的探索與發揮的典範。

《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一書有很多創見。如關於《易傳》解經是以陰陽概念為主，還是以剛柔概念為主？他指出，《易傳》中最早寫成的〈彖〉、〈象〉兩傳，對於《易》卦、易道的論述，是以剛柔為主要觀念的，剛柔在〈彖傳〉出現九十八次，在〈象傳〉出現十九次。而陰陽在〈彖傳〉只出現四次，在〈象傳〉只出現兩次。他發現，〈序卦〉、〈雜卦〉兩傳，根本不用陰陽，而在〈文言〉、〈繫辭〉、〈說卦〉三傳中，主要觀念則是乾坤。他提醒讀者注意，〈象傳〉、〈文言〉並未使用陰陽構成的一套宇宙論，把陰陽用為宇宙論辭語的是〈繫辭傳〉。而〈繫辭傳〉的作者，是從功能的觀念上來談陰陽的，用陰陽來說明易道的作用，不是說天地萬物都由陰陽二氣所構成。戴先生認為，這是先秦儒家與秦漢之際的陰陽家、雜家在思想上極為重要的分際。如果把〈象傳〉、〈文言〉的陰陽與〈繫辭〉的混為一談，這分際就模糊不清了。這是戴先生的心得和對後學的提示，足見他做學問的細膩與深入。

不少學者認為儒家天道論的開展是受道家的影響，戴先生指出，這不是沒有可能，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儒、道兩家由不同進路所體證的天道，內容與意義是不同的，而且儒學本身也自有發展天道論的因素與脈絡。

戴先生指出，戰國後期的儒者，如《中庸》、《易傳》以及《樂記》的作者們，繼承了孔、孟「修人道以證天道」的教義以後，又再往前推進一步，「明天道以弘人道」，於是他們放眼於天地，遊心於萬物，仰觀俯察，興會遂多。

戴先生又指出了《易傳》與《中庸》的異同，他認為《易傳》的作者比《中庸》的作者有更好的憑藉，可以利用卦爻象位對於易道作廣泛的描述。這使易道對於人事的規範與示範作用有更好的發揮。此外，《易傳》作者在道德形上學方面比《中庸》的作者有較多的洞見，如關於易道的體、用，有獨到的見識。這在儒學史上是一重要進展。戴先生特別提示，《易傳》的論述雖有陰陽、剛柔等觀念，但基

本上仍是本體宇宙論的形態，與陰陽家、雜家的氣化宇宙論思想是不同的。戴先生很重視不同的界限，提示後學不要囫圇吞棗，鬍子眉毛一把抓。

戴先生在經典詮釋的過程中，很重視新材料的分析與運用，如帛書《易傳》等。

戴先生晚年住安養中心，然而仍舊心繫學術。書與諸種資料在家中，在夫人的協助下，他們在安養中心與家中兩頭跑了一陣。戴先生晚年雖體衰、精力不濟，然仍克服萬難，以他一貫的作風，認真嚴謹地疏解經典，終而著成《周易經傳疏解》一書。

戴先生認為：《周易》經傳相距七百多年，是華夏文明原始宗教人文化過程中兩個關鍵時期的代表作。經文，是西周初期領導階層借重巫教筮書導引大眾轉向人文思維的成果。它仍保持原始宗教對天的誠敬而又加以擴展，納入對人對事的誠敬，以自助然後人助、天助的理念，闡發人文精神。傳文，則是先秦儒家憑藉《易》書，闡述天道、人道感通為一的理念，開發道德的超越精神，突顯儒學的實踐哲理。經、傳兩者在華夏文明傳統的人文領域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每一個時代都有必要去抉發其中的精義，作為當代生活的指南。

《周易經傳疏解》一書對《周易》經、傳作現代解讀。內容分解說、疏證及綜論三部分。解說著重於文句的通解，疏證著重於義蘊的會通，綜論則分別闡述《易經》、《易傳》之特質。這部著作是戴先生的晚年定論。我認為這部書對入門者與研究者都有用，對前者指明了進入之門，對後者指明了深化之路。

戴先生堂廡甚廣，取徑於實踐智慧學，挖掘道家文化的人文特質，著有《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的專書。透過此書，我們對魏晉玄學有了深度理解。此外，他對韓國大儒李退溪也有研究。

在行政工作方面，戴先生主持文哲所及其籌備處日常工作約十年之久，當之無愧是該所的開創者和首任掌門人，付出尤多，貢獻很大。

為繼承弘揚中國文化理想，他參與了《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輔助教材的編纂工作。他的構想是，學生們在高中階段學習《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打好基礎，到大學階段就可以讀一點五經了。

戴先生嚴謹的工作與生活作風，透顯了他的人格魅力與風範。戴先生是極有教養的人，他「溫而厲」，「威而不猛」，是真君子，用生命的過程體現了一位儒者的君子之德。當下社會，真君子不多了，戴先生的為人為學是我們的楷模。戴先生用

自己的生命詮釋了儒家學問與生命、為人與為學的一致。現代人缺乏教養，戴先生的言行舉止彰顯了何謂教養，以及教養之於人的意義。

「子之所慎：齋，戰，疾。」（《論語·述而》）孔子以敬畏之心慎重地對待這三件事：齋戒、戰爭與疾病。世界與中國經常發生戰爭與瘟疫，直接影響百姓的生存。今天的世界仍然不太平，從俄烏戰爭到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奧密克戎的肆虐。我希望從孔子到熊十力、戴璉璋的中國哲學，對化解今天人類的危機，能起到一些作用。儒學是常新的，是常青樹，端賴一代代儒者的生命實踐，薪火相傳，不絕如縷。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開歲的追思

楊儒賓*

陶淵明詩：「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春天是青陽的季節，生命在此騰躍。在春天遇到凋零，總是異樣的。

今年元月九日，時方改曆，一群朋友難得聚餐。餐畢，即聽到戴璉璋先生業已在前一日安詳往生的消息。乍聞到此消息，不免一時惆悵，人死為大，焉能無感！但戴先生年壽已高，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小周天是大周天的一環。老葉入了秋冬，焉能不辭枝落土！平日疏於問候，不知他平日的身體狀況為何，只因為與他同輩的師長多已陸續辭世，情感的刺激會隨著接到訃聞的次數日益淡化，這是情感效應的遞減定律。所以聽到戴先生的離去，雖然也起了惘然之思，但並沒有引發太多的突兀之感。

戴先生與張亨老師是臺灣師範大學的學友，張老師大一兩屆。張老師的個性溫和中帶些孤冷，蘊藉中卻又有些寡諧，戴先生平易近人多了，張老師與戴先生卻能相契。兩人的學問也有相近之處，同樣治儒道之學，也同樣受教於牟宗三先生，生命中有濃厚的儒家價值理念的因素。民國七十一年，我碩士班畢業，張老師找了戴先生作我的口試委員。戴先生平素溫和可親，提起論文問題，卻是鋒芒犀利，步步到位。我的碩論是學術習作，本不足道，但經過戴先生一番洗刷盤磨，已成型的碩論雖然冥頑難化了，但個人的思考卻受益匪淺。如按舊時代的規矩，戴先生可算是我的座主。

戴先生後來借調到文哲所，還當了籌備處主任多年。他在任期間，文哲所剛成立不久，他需要處理文哲所的硬體設備，也要關心所內同仁的學術動向，新單位初期的首長不易作。但戴先生任內政通人和，文哲所穩健發展，就氣氛而言，似乎

* 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可視為該所的黃金時代。臺灣小，學術規模也不大，他任內期間，我多少有參與該所學術活動的機會。回想起來，每次見到戴先生，總是溫馨的，他就是位溫雅的長者。

最近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戴先生是幾年前的事了，他當時已退休，剛搬移或將搬移到陽明山的養老院之際。忘掉是什麼樣具體的因緣，但多少和我當時談論一九四九的一本小書有關。戴先生和師母請我到臺灣師大附近的春天素食用餐。午後的陽光透過寬宏的玻璃窗流了進來，餐廳人不多，老人家講話舒緩平淡，聲調似乎也在折射的陽光中飄盪。他們談起當年渡海來臺的經歷，談起那一代人的辛酸苦楚，言談之間，不免為他們渡海來臺一代的患難之交叫屈。等民主化伴隨本土化的潮流起來後，他們無意間被擠成了外人，對時局不能不稍感不適。雖然當日的議題並不輕鬆，但這種議題的內容幾乎可以事先預期，所以沒有引發內心太多的干擾。何況老人家人老溫厚，意氣自平，恍惚間居然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輕淡。

那次是我初次見到戴師母，我也是那時才知道戴師母是唐亦男先生的妹妹。王淮與唐亦男伉儷也是臺灣師大出身。張老師年輕時和王淮先生似乎很熟，聽說曾推薦王淮先生到臺大任教，後來不知因何無成。之所以聯想到唐亦男先生，乃因和戴先生伉儷聚餐後不久，或許也有段日子了，碰巧在大學出版社聯展的場合遇到唐亦男先生，原本生氣勃勃的她已坐輪椅入場了。她當時剛在成大出了套新書，看到我，不免一陣驚愕。不久，我就收到她寄來的新書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我開始任教後不久的前幾年，在香港的一次會議中，唐先生對我談儒者的工夫境界與宗教的冥契經驗之關係，甚不以為然，反應頗激烈。沒想到在她退休後一次新書發表會的場合，居然不期而遇。人步入老境，往日學術議題的是非自然已淡如雲煙，意氣不平自平。前後兩次見面，一隔差不多也就二、三十年了，這次的巧遇還是令人愉快的。

從唐亦男先生贈送的新書中，我才知道唐先生與戴師母她們兩姊妹來臺的波折，或說是傳奇更恰當。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誰能臆測時局下一步如何變化？誰又能做好周全準備才起步動身？錯失了這班飛機，也許就是錯失了一個時代，生為中華民國之人，死為共產中國之鬼。事起倉促，她們姊妹到底還是來了臺灣。唐亦男先生豪爽俊朗，頗有巾幗英雄之風，很會鼓舞學生，成大中文系的學生不少人受到她影響。猶記得牟宗三先生閒談時偶爾說到她，曾開玩笑地說，難怪名為亦男。戴師母個性似乎與乃姊不同，嫻靜許多，這種印象出自飯後茶點時間所得，當

然是浮光掠影的。

唐亦男先生比戴先生更早走一步。戴先生、唐亦男先生，還有張老師這輩的老師有些共相，他們都有老師樣，很像早期師範學院體系期待的人格型態。他們在青少年時期，捱過苦難的對日抗戰，又經歷了二十世紀中國更大苦難的國共內戰。他們輾轉來臺，在異地生根，在異地教異鄉子弟，孜孜矻矻，黽勉從事，就像國史上那些優良的教師。最後，異地不再是異地，異鄉子弟更是成了家鄉的子弟，流離的歲月轉化了場所的意義。

戴先生將他的一生付與教研工作，生涯單純，但語及時事，精神仍不免鬱抑。他們那一代的人多半隨著國府的軍公教機構輾轉來臺，他們的命運遂和國府在臺灣的處境密不可分。一九四九渡海事件是臺灣史上最大也最複雜的單一移民事件，以全中國的規格設計的政治體制一遷移到島嶼，納須彌於芥子，齟齬衝突，勢不可避免。它也不免會遭遇到東晉永嘉南渡後的「僑姓」與「吳姓」相爭的「省籍」問題。隨著島內政治情況的改變，國府渡臺事件的解釋即難免有紛歧，噪音不斷，原來認同的圖像閃爍變幻，如風中之燭。人的時間意識總是剎那即含過去與未來，記憶從來不曾遺失。歷史一被勾起，勾起的不是過去的事件，而是當下的生命，戴先生那一代人的心情自然會受到影響。但臺灣是被各種政治勢力編織打造的島嶼，不定期的轉型行動自然會出現，歷史總有無情的一面。

但一面終究是一面，歷史的另一面也許沒有那麼無情。至少比起歷代的改朝換代，或政治的大變遷，一九四九之後的臺灣時局之演變是最和平的，而且是「主權在民」這個偉大理念在中國史的初步登場，朝野都在摸索中前進。如果沒意外的話，這個正能量的趨勢還是會一路向上的。原來的矛盾總有一天會變成動力，所謂的外來也會成為本土。這個轉型的工程是許多人共同推動的，其中包含了戴先生他們那一代人付出的血與淚，但血與淚也可以灌溉出珍貴的文化果實的。

在那日溫馨的餐敘中，我忘了如何回應戴先生溫和而略帶感傷的語調，很可能是將昔年的風雷事件付與當日的漁樵閒話，沒有太正式的回應。但我相信假如我們可以信任歷史法庭的公正，一九四九渡海事件的意義還是有可能日益發酵，調適而上遂，修得正果的。我們或許有機會遇上百年難得一遇的歷史時刻，既是臺灣時刻，也是中國時刻，戴先生應該也是如此企盼的。願戴先生安息，在他喜歡的地方得大自在，像他喜歡的莊子的大鵬鳥般的翱翔。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憶戴兄璉璋先生

李瑞全*

手撫伴我數年之《詩經選讀》，上有璉璋兄之贈語數字，行雲流水，不滯不離。未讀詩篇，已有神妙萬物之思，亦思而無思也耶！這是最後與璉璋兄相視而笑的一瞬間，厚顏從璉璋兄講臺上恭請而得。余喜內無章句之瑣碎，只直道詩情詩意，還它來自天地之襟懷，不亦快哉！蓋亦唯古之詩人，所以能怨，怨而無怨也。

人生之遇，莫知其始。與璉璋兄之交，自是同遊於牟師宗三之圈內。璉璋兄為牟師早年高弟，余則是驥尾之隨。從香港來臺，初見時，猶似混沌未開之世界。璉璋兄坐於筵席之間，師友一堂，縱目而視，俊逸瞿然在其中者是。人或只見兄之肅然而犀利，我愚而無知，唯溫暖如玉之感。當下只是相視而笑，未曾有世俗之酬酢。然吾兄之音容，宛似停雲，淵峙川流，莫之能忘，或一日重開，常有清風隨來之自然順適。既同遊於方外，乘雲氣，搏扶搖而上，蓋亦圈而無圈也。

余入牟師之門也晚，於師早年門人，由於機緣，與仁厚兄共講學於東海，自是往來甚深。然登門造訪，璉璋兄為唯二之一，實亦只二回而已。猶憶某年新春，祖漢兄領至吾兄之尊邸，忘其因由，也記不起庭園故事。府內只有一堂一室，卻有無限空靈不著之大字。當日午聚於粵式茶樓，滿盤美點，與吾兄尊嫂共慶春寒，亦非偶然也。

憶昔余未進大學之時，固多習數理邏輯之學，然亦喜讀莊生之書，自〈逍遙遊〉以至〈應帝王〉，雖不了了，亦自感心有所嚮。面試時，牟師問以何所了了，余不能答，亦不敢強答。師以為可教，逕予取錄。於是物理、數學之門，不復進矣。余以為莊生與孟子實為不世出之雙胞胎。孟子正義利於人間道上，莊生逍遙於無端崖之九天。孟子盡破世間之苦惑，睥睨乎天下之王侯，莊生悲憫人間之彼是，

* 李瑞全，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曳尾於無何有之鄉。兄為孟子乎？為莊生乎？必也一體而圓融乎！吾與兄也。

年前知兄嫂歸隱於市中，屢請瑩暖致意，終未能再一遇，亦不敢勉強也。蓋虔誠者終必相遇，不在朝夕。爾而得賜《周易經傳疏解》，喜而讀之，質樸如古語，無怪力亂神，亦不似《詩經選讀》之彬彬。乃知君子之通人我隱顯之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道性命相貫通，死生無憾矣。

兄我終會於靈堂之上，雖不能言，唯共照於天。弟乃天刑之徒，未能三號而出，君子莫笑。特驅車，敬從陽明山上，伴以花魂，長留心間。四顧山清日麗，白雲邈邈，環迴於天地，一逍遙一切逍遙。君子之歸也，休焉息焉。是為禱。

愚弟瑞全拜，時維壬寅年四月初五日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回憶戴璉璋老師

黃敏浩*

中研院文哲所通知，驚悉戴璉璋老師逝世的消息，並獲邀撰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其實，我跟戴老師並不熟悉，但我還是很快便答應了。

戴老師的大名，最初是從張亨老師那裏聽來的。當年在我碩士論文口試時，張老師本想請戴老師當校外口試委員，但他因事不能參與，最後請了黃錦鉉老師。雖然緣慳一面，戴老師的名字卻從此一直記在心裏。

原來戴老師和張老師是好友。彭毅老師（張師母）曾提起，說戴老師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師許世瑛先生，並時常關顧許先生。許先生逝世後，仍一如既往照顧許師母。有一段時間，牟宗三先生來臺灣講學，生活各方面也是由戴老師照顧的。據說牟先生把錢都交給了戴老師，由他打點一切。彭老師說戴老師「不忘本」，我聽後頗感動。這些上一輩的學者所具有的難能可貴的品德，似乎已越來越少見了。

戴老師跟我初次接觸，應是我在臺灣碩士畢業多年後，以學者身分到中研院文哲所訪問之時。那時戴老師任文哲所籌備處主任，因職位的需要與我有短暫的交談。初見戴老師時，我不期然地想起自己十分尊敬的羅時憲教授。我曾在香港及加拿大跟從羅公學佛。戴老師和羅公長得很像，前者是魏晉玄學的專家，後者是唯識學的學者。羅公眉宇之間有英氣，戴老師則態度溫和。當時我跟戴老師交談，感覺良好。離開時他還怕我不熟悉文哲所，特別追上來叮嚀幾句。這雖是小事，卻使我內心很溫暖。文哲所每每給我親切之感，戴老師接待我的這段經歷肯定是其中一個原因。

最後一次見到戴老師，是在數年前，那時我剛好在臺灣，機緣巧合，與林月惠到戴老師家，接他去拜訪彭毅老師。原來戴老師準備第二天便搬到安老院，家中早

* 黃敏浩，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已收拾一空。他仍是十分隨和，跟我們閒話家常。當中談到文哲所招聘研究員的一段往事，他大概以為我已知此事，而且談話主要對象是林月惠，是以沒有詳細說明原委。我聽得有點糊里糊塗，但大概知道文哲所因那次招聘曾受批評，然而戴老師問心無愧，似乎想藉此憶述表明心迹。他隨口提及，可知他一直沒有忘懷此事。直覺告訴我，他是一位事事問心，問自己有沒有對不起別人的人，難怪他總給我親和的感覺。其後在《余英時回憶錄》中看到此事的敘述，才較清楚當中的來龍去脈。談了一陣後，便由林月惠駕車送大家到溫州街彭老師的住所。當時張老師已離世，由彭老師接待我們。彭老師與戴老師坐下來談，我們坐在旁邊聽著，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如沐春風。戴老師談到住安老院的好處，建議彭老師如獨居不便，也可考慮搬進去云云。我心想，戴老師對住安老院持積極樂觀的態度，實在難得，住進去後必會生活得很好。沒想到不過數年，他便因心臟衰竭而辭世。老實說，當我收到他逝世的消息時，心中免不了驚訝與失落。

戴老師在學術上的成就，我沒有資格評論，只知他的著作包括古漢語語法方面的，還有《易傳》及魏晉玄學的研究。我讀過他的《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裏面論及王弼、阮籍、嵇康、郭象、僧肇與成玄英，都是魏晉玄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認為他對玄學各家思想的了解極為相應，對各家的文獻也非常嫻熟，否則很難做出書中所做的對比。他在表達自己的見解而不同於別人時，只是就事論事，如以「貴無論」與「崇有論」並非對立、嵇康之〈聲無哀樂論〉實為通於道之論等，都表達得平直而誠懇，毫無矜誇之意。這大概也是從他的人格透露出來的為文風格。

回憶戴老師，總令我想起自己的老師或前輩學者們的一種人格風範。他們似乎有一種特質，此特質在後一輩學者中實難再有，將隨時代的過去而消逝。我只能緬懷之，卻不能恢復、保留之。再隔一代，恐怕連緬懷之也成奢望。每想到此，常感一陣莫名的難過。

※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段心儀*

自九五暫綱刪減高中國文學分以來，爭取「恢復文化經典與古文在國文科中應有的比重」一直是我們不變的志業。漫漫長路十八年，屢仆屢起，總有人問起：「這份自信與堅持是哪來的？」其實，我們也自問。但略一凝神，一個個身影就浮現眼前，他們的生命歷程正是經典的見證。余光中老師如此，朱守亮老師如此，戴璉璋老師也如此。他們與經典相識於青少年時期，此後一生常相左右。「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經典護持他們度過生命中各種考驗，他們也把生命活成儒者的典型。事實上，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是護持臺灣學子享有這份幸運的權利。

我是政大中文系畢業，四年級導師是朱守亮老師。畢業前夕，朱老師的贈言：「為語橋下東流水，出山要比在山清」，隨時在耳邊響起。我雖無緣親炙戴老師，但執教中山女高時，陳靜瑩、莊滄芬老師等好友都是戴老師的嫡傳弟子。她們聊起研究所的往事，對戴老師教學的嚴謹、講課的條理分明，都津津樂道。靜瑩老師還說：「每次《論語》課，上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我就覺得在講戴老師。上課時，任何同學回答一含糊，老師就針對含糊處叫他寫個報告過來，我在旁邊冷汗直冒；但下課後去問問題，老師又是和顏悅色，細細回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真的，老師就像子夏說的這樣啊！」

民國九十三年，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本預定於民國九十四年實施，後因爭議太大，延至九十五年方以「暫綱」身分面世。因高中國文學分減少，「暫綱」降低教材中文言文比例，減少古典文學與經典選文的篇目，並以「論孟選讀」的選修學分取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 段心儀，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秘書長。

的必修學分。高中國文老師聞之譁然，因為國文科的教學目標有三：語文、文學、文化，經典承載的正是文化的源頭。斷喪經典，學科就失去核心精神。我們遂結合社會各界賢達，幾經抗爭，歷時數年，才終於在一〇一課綱中，爭取到「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必選學分，我也因此與戴老師結緣。

戴老師本就關注儒學復興一事，眼見國文課綱的波折，「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學分失而復得，認為經典活化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他認為經典語言必須接軌當代，不能讓年輕人對經典疏離而排斥，否則空有學分，教學效果也不彰。於是戴老師囑咐門生謝大寧教授，爭取到教育部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輔助教材的編纂計畫。他又組織學界中重要的儒學研究者，尤其以青壯派為主，並延攬高中教師共同編纂，完成一部既有義理高度，亦符合教學所需之教材。編纂期間，先生以八十高齡，與學者、教師字斟句酌，修改教材內容。每次會議均長達七、八小時之久，會後先生每需息養三日，方能恢復體力。先生對經典教育之投入與執著，可見一斑。事實上，若無望重士林的戴老師登高一呼，這本匯聚數十位學界菁英共同研發的教材，不可能完成。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輔助教材編纂完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學科中心」也成立了，推廣這本教材的工作正式展開。戴老師體認到詮釋者的重要性，親自參與種子教師的培訓活動。我還記得第一場培訓是在惠蓀林場舉辦，戴老師偕同師母一起參加。山下雖是夏日炎炎，暑熱蒸騰；山上卻是綠蔭蓊鬱，寂靜清幽。戴老師精神奕奕，談笑風生，對現場參加培訓的講師學員都多所期許。他以熱情激發參與者的熱情，讓大家認知到發揚文化道統的重擔就在自己肩上，必須捍衛臺灣居於中華文化重鎮的地位。但當時教育政策已進入「一綱多本」的時代，「部編本」教材完全沒有當年「國編本」教材的優勢，既不能由政府主導進入校園，又不像民間出版社有大量業務員協助行銷，只能掛在學科中心網站上面，歡迎學校或老師自由下載使用，弱化了這本教材活化經典的使命。一〇八課綱之後更是情勢丕變。

「一〇八總綱」將國文教育簡化為「語文」教育，不再肩負「中華傳統文學、文化」的責任。總綱核心素養的三大面向、九大項目中，國文的核心任務變成「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原來的四學分被減為二學分，且沒有獨立課綱，形同失去單獨科目的地位，被整併入了《國文》。無論是教材或教學，都被弱化。因為各版本都把文化教材併入國文課本，不再單獨成書，部編本《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沒有機會出現在各校師生眼前。

我相信對戴老師來說，費盡心力護持的這套教材，若真的從此無聲無息於世間，絕非一聲長嘆了得。且何止戴老師，我也相信每一位參與教材編纂的教授、老師、研究助理……都無法接受心血的付諸東流。戴老師若是指引我們前行的明燈，未來在這條漫漫長路上，我們就要做自己的炬火。「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戴老師見證了儒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的生命歷程。我們該做的，就是讓這份堅持與努力，死而未已，死而不已！